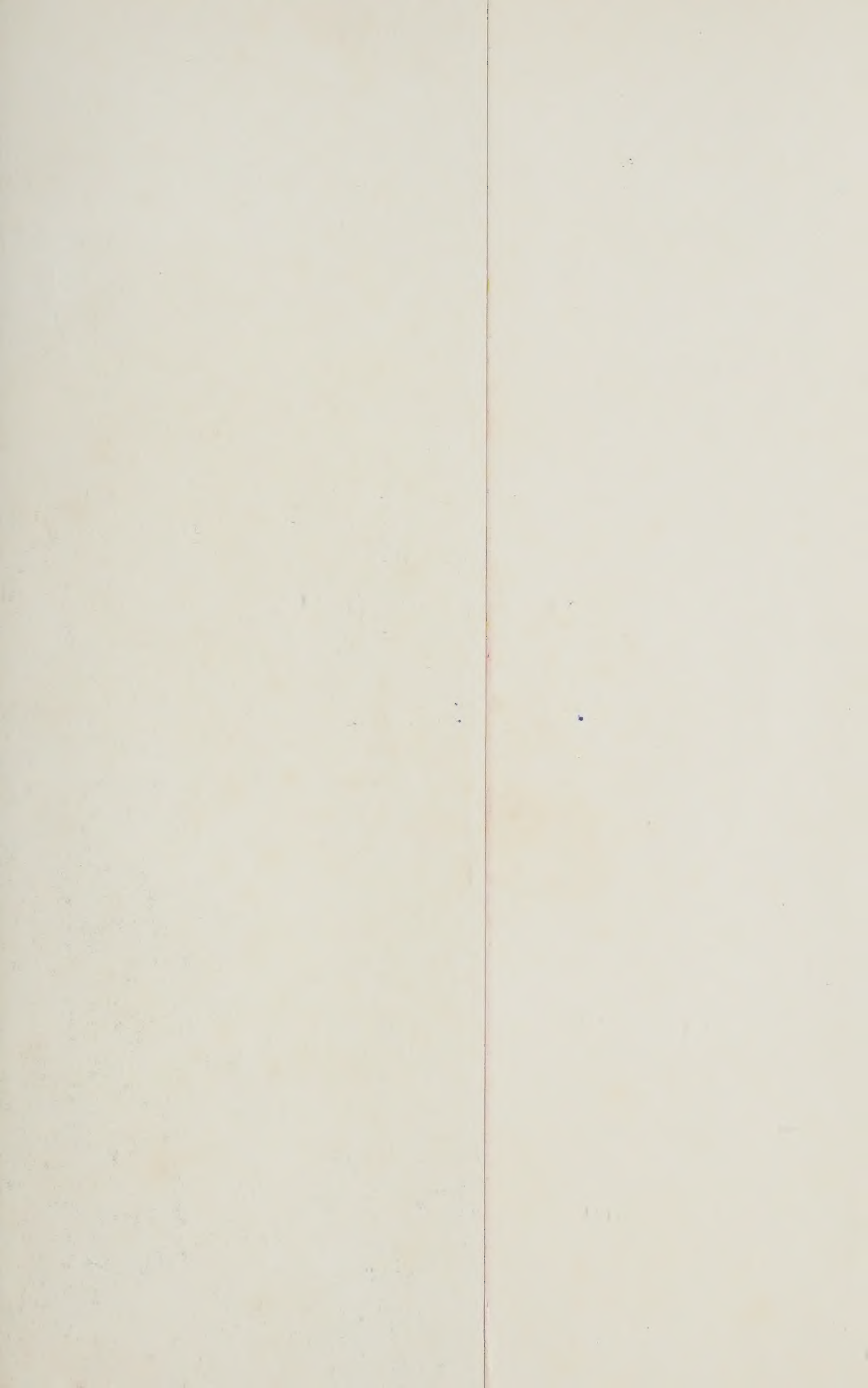


亞倫德與智利

陸　　鳴編譯

七十年代雜誌社



亞倫德與智利

陸　　鳴編譯

七十年代雜誌社

亞倫德與智利

編譯者：陸　鳴
出　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三樓
電　話：5-458564
印　刷：新華印刷股份公司
鰂魚涌華厦工業大厦四樓B座

1974年10月版·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目錄



前言

智利在「人民聯盟」的候選人薩爾瓦多·亞倫德當選了智利總統時，曾經給予不少西方國家，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一個使用議會道路建立社會主義的幻想，有一些西方國家的大衆傳播機構的「專欄」作家利用亞倫德在智利的例子，大事宣揚，謂馬克思主義所堅持和强調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奪取政權」的論調，今天已經是不合時宜的事情了。與此同時，一些西方報刋大都不約而同的把亞倫德說成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把由亞倫德領導的聯合政府說成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府」。由於這些西方大衆傳播機構的影響下，我們處在和智利相隔天涯的北半球的香港，對智利的眞實情況的確是不大了了，爲了這些原因，我們編寫了這本小册子，希望向讀者介紹智利的眞實情況。我們將從歷史方面、亞倫德的理想、亞倫德當政前後智利的情況這幾個方面介紹，希望讀者能對智利有一個較爲全面認識，對亞倫德的理想和他的「社會主義道路」有進一步的了解。

編者　一九七四年

本書名詞簡介

政黨

右派：

基督民主黨(Partido Democrata Cristiano 簡稱PDC)：人民聯盟上台之前的執政黨（一九六四至七〇年）。

國民黨(Partido Nacional簡稱PN)

左派：

人民聯盟(Unidad Popular 簡稱UP)：左派和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陣綫，於一九七〇年九月的大選中獲勝，於一九七三年九月的軍事政變中被推翻。亞倫德就是這個聯合陣綫的領袖。人民聯盟由以下六個政黨和組織組成：社會黨、共產黨、激進黨、社會民主黨、人民統一行動運動和人民獨立行動黨。

社會黨(簡稱PS)：人民聯盟的最大政黨。亞倫德是社會黨黨員。

共產黨(簡稱PC)：人民聯盟的第二最大政黨。

激進黨(簡稱PR)：人民聯盟中一個較小的政黨。

社會民主黨(簡稱PSD)：人民聯盟的最小政黨之一，自稱支持革命的社會主義，與歐洲的一般社會民主黨不同。

人民統一行動運動(簡稱MAPU)：一九六九年由一班分裂自基督民主黨的人士組成。

人民獨立行動黨(簡稱API)：人民聯盟的最小政黨之一，黨員一般屬於中產階級。

革命左派運動(Movimiento de la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簡稱MIR)：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它支持人民聯盟，但對後者的一些做法亦很有意見。

左派基督徒運動(Movimiento de la Izquierda Cristiana 簡稱 MIC)：成立於一九七一年中，成員包括不能忍受基督民主黨日益右傾政策的左派黨員和部分人民統一行動運動的成員。這個組織的目的是要在非左派中爭取對人民聯盟的支持。

其他名詞

土地改革局(Corporacion de Reforma Agraria簡稱CORA)：是一個國家機構。

土地改革中心(簡稱CERA)：國營農場。

智利工人聯會(簡稱FOCH)：「全國工人聯會」的前身。

全國工人聯會(簡稱CUT)：是智利工人的總工會。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簡稱ITT)：一個龐大的美資企業，它擁有「智利電話公司」和智利很多其他賺錢的企業。

革命農民運動(簡稱MCR)：是「革命左派運動」領導的一個羣衆陣綫。

革命工人陣綫(簡稱FTR)：亦是「革命左派運動」領導的一個羣衆組織。

一、智利的歷史和地理簡況

在成爲殖民地以前，智利的土地上有許多印第安人的部族，畜牧農耕，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自從哥倫布、麥哲倫等探險家踏足南北美洲，他們的厄運也就開始了。

西班牙可說是歐洲殖民主義國家的鼻祖。遠在十五世紀末，西班牙的殖民主義者爲了搶奪金銀，便四出探險以找尋殖民地。一五三一年比薩路征服了秘魯的印加帝國，在利馬建立了西班牙南美殖民地帝國的首都。一五三三年，亞馬高由秘魯出發沿安第斯山脈進入智利中部的沿海沃野，於是智利也成了殖民地。西班牙人在沿海平原上建立了許多西班牙式的墟市作爲居住、統治及搶奪資源的中心。（例如中部谷地的聖地牙哥及附近之港口瓦以帕來索等）以後一直經歷了近三世紀的殖民統治，到一八二〇年左右才得到獨立。

智利的地形狹長，主要由安第斯山脈及沿海平原構成。北部是沙漠，有豐富的煤、硝礦。中部有銅、鐵、銀等金屬礦藏，而且農業發達，盛產小麥及各種水果。南部則森林密佈，木材儲量頗富。其他的水力資源及優良的牧場都很多。所以智利是一個有豐富的林、

農、漁、牧、礦資源的國家。

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初時爲智利的金礦所吸引，所以在十六世紀，智利的主要出口是金及獸脂（由牲畜所得，用作製蠟燭）。其後到了十七世紀，由於金礦藏量不多，礦苗分散，以及勞動力不足等因素，礦業因而衰退，但農業，特別是小麥（輸往秘魯利馬）及水果，却發達起來，成爲主要出口商品。到十八世紀，礦業又再次興盛，銅銀等產量大增，與小麥共同成爲主要出口商品。而畜牧業却開始走下坡了。十九世紀由於找到了硝礦，硝石生產躍升，成爲極重要出口商品。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發明了用化學方法直接合成硝酸，外國對硝石的需求從此銳減，硝礦場才大量地被拋棄。與此同時，小麥的出口却發展到極峯，遠銷至歐洲及世界其他地方。後來却因受到美國等的競爭而日走下坡。今天，銅礦出口是智利的主要外滙來源。

十六至十八世紀——殖民地經濟的建立

國內階層的分化和土地的兼併

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智利建立了奴隸制度：將印第安人變成奴隸，從事開礦、採礦等

工作。由於殘酷的壓迫、繁重的勞動以及由西方人帶來的疾病等使印第安人口銳減，而刮削資源所需的勞力却日增，所以西班牙人曾將黑奴帶到南美洲。最初期的社會上就只有這種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但後來，移民逐漸增加，以及西印混血兒的普遍化，於是隨着農礦業的發展，西班牙血統中的階級分化也逐漸出現了。

殖民地時期有各式各樣的土地領有權；例如皇室封地，對於帝國有功者的賜地，長官們的治區或對某地區的農產品有收取進獻的權利等。此外還有部分土地仍屬於印第安的部族，未被侵佔。由於氣候及土壤的條件頗佳，西班牙人便從歐洲引進糧食及牲畜來發展農牧業，建立了一些頗具規模的農牧場，由白人地主管理，使用印第安奴隸工作。初期因爲當時土地尚多，地主未能盡予利用，故亦有將一些小塊地讓與無地的白人或混血種人耕作，只收少量象徵式的款項。

秘魯地震後情形就不同了。智利小麥大量向利馬出口，以後擴至其他地方，其他農牧產品也開始大量出口。土地的價値隨之上升，兼併之風大盛：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强佔，混血種人甚至白人小農的私人土地亦被用非法手段（如賄賂官員及僞造文件）來佔據。大規模的土地兼併也在進行。土地由於分傳給子女而化整爲零（這對農業是不利的）。天氣的惡劣，市價的波動往往使這些小地主們負債、甚至破產。於是大地主便得以擴充地

盤。

土地的升值導致了新的社會關係：以前那些在大農場中分得土地的人被要求交地租了——這就是佃農制的建立。

於是到了十八世紀末，社會中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個由大地主大商人（掌握了運輸、倉庫及出入口貿易）及殖民地長官（他們的高薪及地位使他們很易成爲商人及地主）組成的掌握智利政治經濟的階級。當然在另一面有只靠出賣勞力來維生的各業工人，還有介於兩者間的小地主、佃農和小商人等。

國內外商人操縱下的出口貿易

在國際交易上，殖民地的智利一直受到祕魯利馬商人的控制。祕魯是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的經濟中心，在其首都利馬逐漸形成了一個商人壟斷集團。它控制了祕魯及其他殖民地的許多經濟活動，彷彿是西班牙殖民地帝國中的帝國。智利所有對外貿易(包括西班牙)都以祕魯爲轉運站，故此它的出入口都在此集團控制之下，智利本身之商團雖有不滿，但亦無法與之抗衡。

集團從貿易上所得的利潤奇厚：有些貨物只要付出約十多天的海運費用，便可得一至

三倍的中間利潤！所以他們不顧一切地保衛已有的市場，開闢新的市場。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智利小麥之交易。爲了對付智利商人的不滿，各成員將選購工作及海運統一處理，以便集中力量。爲了增加利潤，他們必須增加進口，也就必須打擊秘魯本身的麥產。所以他們不惜將智利小麥留着，直到秘魯農人收穫時才以低價放出。由於智利產麥的天然條件較秘魯爲優，再加上一六八七年秘魯大地震以致農業失收，從此智利小麥便佔據了祕魯市場。

智利國內的商人又怎樣呢？他們爲了賺取利潤，不顧本國利益而大舉出口，造成國內物資缺乏，物價暴漲。例如一五八三年的聖地牙哥市議會就通過：「由於本市嚴重缺乏蠟燭和獸脂……無人在得到議會准許前能將這等物件運出。」又如在一六九三年該市議會又命令：「不論任何人士都不能由本城輸出小麥、麵粉、餅乾等……」許多限制出口措施如出口准許證、出口限額，甚至在一六九五年還嘗試實施完全禁止聖地牙哥一帶地方出口小麥的行動，但都無效。主要原因就是官商一體，官員還從證書的售賣中發了財。這些由於商人們拚命出口以及屯積居奇所造成的物資缺乏，在聖地牙哥市議會的文件中可以發現數以百計的事例！

大量出口必然引起大量入口。

入口的特點之一就是消費品的需求甚殷。大地主、大商人財源廣進，必然講究享受，於是從歐洲大量買入高級消費品。他們爲了多做生意以便圖利，設法向其他人民推銷外貨。這麽一來，國家的對外收支平衡便出了問題。事態的嚴重可由一六三一年聖地牙哥市議會對服裝改革的下列號令中看出：「第一項：不論任何地位的男女都不准穿着奢華的服裝或金飾銀飾，不准穿絲織品……第十四項：爲了使市民們不因多餘的浪費的開支而毀滅自己，我們制定法例如下：無論在任何活動中，市民都必須保持適中的消費及作風，以簡樸爲原則。」另外又說：「那些發明或介紹新的消費方式的人」將受處罰。

與此同時，平價的歐洲貨物大量入口，使本國工業大受打擊。在十六世紀，智利根本沒有什麽工業，所以影響還小。在十七世紀，由於歐洲方面戰爭的經濟低潮影響，大西洋航運劇降。智利本身亦金苗枯竭，勞力不足。所以出口入口都減少。這反而刺激了本國工業生產「入口替代品」。許多礦場主等都發展其他業務以補償礦業的低沉。因此手工業品如繩索、紡織等產量都頗有進展。並經利馬運銷南美中美各地。但到了十八世紀，歐貨再

大舉進口，特別是在一七八八年，西班牙宣佈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後，智利港口對外開放(以前法定智利出入口都經由利馬)，以前走私入口的貨物現在可以名正言順的運入了。於是收支不平衡、工業下降等問題更形尖銳。

十九世紀——國家資本主義的嘗試

國家資本主義嘗試的概要

十九世紀的智利努力試圖以國家資本主義(以國家的投資和政策控制來推行發展計劃)將智利的經濟依附性消除並擺脫殖民地的從屬地位，但結果都失敗了。這個過程大概可以分爲以下幾個時期：

（一）一八二〇至六〇年——智利擺脫西班牙統治而獨立後，許多任的執政者都推行了保護主義的政策，以促進本國工礦業的發展。其中表表者有奧赫建斯總統(O' Higgins，獨立運動之領導人)，普第路斯總理(Portales)，及賓尼斯(Bulnes)、芒特(Montt)兩位總統。

（二）一八六〇至六五年——爲自由貿易與開放經濟政策時期，智利經濟逐漸被外國

(主要是英國)控制。

(三)巴馬西達(Balmaceda)總統時期——又再推行了一些反對外國控制、發展本國工業的經濟政策，但以失敗告終。以後便是智利經濟受外人控制越來越深的情形，並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

以下是有關各個時期的較詳細情形。

獨立初期的經濟發展

在獨立初期，由於擺脫了西班牙的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有更多的生產利潤不被剝奪，因而能夠再投資在本國的工礦業。於是智利經濟頗有蓬勃發展的景象。正如一八三四年的財政部長蘭吉傅對議會的報告說：「每一處城市都在擴展和美化，農業正在發達中……豐富的礦場正在把它們的寶藏獻出，商業繁茂……新的工業開始在國土上生根成長……」同時也有許多其他刺激發展的因素。例如在一八四五年後煤礦的發現，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引致智利移民前往；因而使智利對該區之工農產品出口大增等。

智利的重工業也得到大力提倡。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它們已能夠製出火車頭、農機、武器等。

這許多進展都是與智利政府的經濟保護性法例分不開的。例如一八三五年蘭吉傳推行之關稅改革對發展智利海運事業有很大幫助。改革的要點是：由智利建造的商船所載進口貨可減關稅百分之二十，由智利所屬但由外國製造的商船載運者則可減百分之十。故此智利商船隊由一八四八年之一百零三艘增至一八八五年的二百五十七艘。由於智利積極發展自己的海運及商業，引起了與祕魯利馬商人壟斷集團的衝突（在西班牙統治時期智利輸出幾乎全由利馬商人控制），便導致一八三七年與祕魯的戰爭。

出口的盲目擴展

由於智利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再加上利潤的投資在本國促使農礦業發展，所以智利的出口增長極快。一八四四至六〇年中出口增長了四倍，其中銅增加近八倍，農產增了五倍。出口的增加、利潤的提高帶來更多的資金作再投資，對智利的經濟發展必然有好處，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也必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資本家們為了追求利潤，只要在國際市場上有利可圖時便會不顧一切的擴展生產。例如：由於小麥的銷路好，農場主們便將畜牧場改成農場；智利政府為了給資本家們更多的種麥地，便發動了對南部亞流根奴斯族印第安人的戰爭，以武力奪取他們世世代代賴以謀生的土地。不過，世界市場需求的變動性

是很大的，而且有很多增加需求的因素是暫時性的，再加上國際競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如周期性的國際性經濟衰退等），智利的出口情況非常動盪，這對經濟發展有不良的影響。當出口量越大，災禍性則越深。例如小麥受加利福尼亞及澳洲尋金熱的影響，出口曾顯著上升，但當熱潮一過，美國、加拿大小麥的競爭逐漸加强，智利小麥輸出使日益被壓縮。又如在一八五七年世界性的經濟困難中，外國需求銳降，智利最大港口瓦以帕來索的商業買賣就幾乎全部停頓。農村的土地價格竟下跌四成，使許多人破產。

自由貿易的推行及後果

西方的資本主義强國如英、法等對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的壓迫是無時或止的，智利擺脫了西班牙的直接軍力控制，却擺脫不了英國的經濟套索。雖然出口量之大幅度波動曾對智利經濟有很大的破壞性，但使智利獨立後頭四、五十年的國家資本主義建設努力遭到失敗的原兇却是「自由貿易」的推行。

本來歐洲各國如英、法、荷等都是採取一種保護性的經濟政策的，由國家支配投資發展，以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工業。在此情形下，各國的工業革命都先後開展建成了技術優良、生產力龐大的工業體系。由於經濟需要及本國貨物的競爭能力已很高，各國亦先後採

取了「自由貿易」的政策。關稅降低及貿易限制解除後，發達的國家便可以很容易的買入原料和推銷製成品。當然，這對未發展起來的國家是不利的。因爲他們的貨品競爭力較弱，打不進發達國家的市場，相反的却讓人家打進來。英國是最先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因而也是最先採用「自由貿易」的國家。爲了推銷貨品，英國便誘迫他國同樣接受這政策。智利的情形正是一個實例。

一八五三年，英國會向智利游說自由貿易的好處：「一個開放的貿易政策將可在智利得到如英倫的同樣效果，就是政府收入增加，人民的享受亦提高。這種體制在英國經長期考慮而施行後已收到比最樂觀估計還好的成功。所以，對智利政府來說這是十分值得一試的。」當然另外還有壓迫的手段。例如同年，英國駐聖地牙哥代表因智利通過增加銅的出口稅而提出抗議說：「提煉銅礦的工廠已經建立，銅的貿易有上漲的趨勢。但（智利）新通過的法律將會影響我國的煉銅企業，同時亦減退了智利開採及出口其本身礦產資源的利益……英國政府非常希望這法例能夠解除……」

智利的保護性貿易政策一直維持到芒特總統的任內。國內的反對勢力，如那些大礦場主與大農場主們（因爲自由政策對出口有利，可增加他們的生意），利用一八五七年由於世界性不景氣所造成的國內困難來反對芒特及其國家發展政策。到了芒特退任後，自由貿易

便開始推行了。

自由貿易的惡果是多方面的：

（一）芒特總統的下一任時，財政部長便消除了對智利船隻的特別優惠關稅制度。一八六〇至七〇年中，海運增加了三倍，但智利的商船隊由一八六〇年的二百七十六艘退到一八六九年的二十一艘！所以海運簡直是被外資壟斷了。

（二）英國壟斷了智利銅礦的提煉、運輸、銷售等各方面，又任意造市來操縱銅價。例如最顯著的伎倆就是：當英國人知道有銅從智利運出時，他們便壓低價格以便船到時購入廉價貨物。當貨到手時便抬升銅價。於是這樣就造成了銅價的長期波動。當英資逐漸能插手礦場本身時，其活動力就更大更易了。

（三）英國商人不但壟斷了智利的國際貿易，更插手到許多智利內部的貿易機構。那些英國批發商人、商業機構在智利放貸，推行貨幣業務，甚至可以發行貨幣，儼然像銀行機構。

（四）智利與許多歐洲國家都簽訂了「最優惠國」協議，並放低關稅率。

於是，智利的工業、航運便由於競爭力不夠，漸漸萎縮及落入外資手上了。智利資本被外資的逐漸排斥，可以清楚的從硝礦的開發中看到。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智利與祕魯資本便開始開發在祕魯與玻利維亞的硝石礦。這裏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型硝石礦藏，作爲肥田料的硝石是農業發展的必需品。所以硝石的出口貿易能帶來很大利潤。智利政府爲了爭奪資源，不惜向祕魯與玻利維亞開戰，爆發了南美之「太平洋戰爭」，結果得勝，這些毗連智利的硝石產地全部到手。但辛苦的大戰一場，誰人得到實利呢？

在戰前，硝石礦的資本額分配如下，英、美佔百分之十三，祕、智佔百分之六十七，其他百分之二十，屬於居留於智利的外僑。但到戰後的一八八四年，祕魯資本全部消失，智利資本減至百分之三十六，英資上升至百分之三十四。原來在戰後，祕魯所發行的股份價值大跌，有人便乘機以其原價之一至二成買入。到了後來智利政府宣佈承認祕魯股份的權利時，這些人便因此而發達了。英國人約翰·羅夫從智利貸款機構借得六百萬美元收買硝石礦股份以及運礦鐵路而成了「硝石大王」。

以後，外資壟斷情形越形嚴重。退任的部長亞登尼在一八九三年也承認硝石工業已完全落入外人手中。運輸的鐵路、船隻都是外資的，機器的燃料全是英國來的，所有由生產至消費的中間交易及利潤都是外國人掌握的。

不過，在智利也有反對這種經濟情況的人。在一八八三年成立的「工業發展會」，就會提出智利可以而且應該工業化的理論。總括來說，其理由是（一）資源豐富，有各種重要的礦藏如銅、鐵、煤炭、硝、硫，而且儲量異常的豐富；有各種木材、蔬、絲等；有各種牲畜產品如皮革、羊毛等。（二）本國有廉價而能幹之勞力。（三）出口的不可靠。例如由於智利比其他產麥國小得多，所以將來智利小麥出口將被迫停止。而且該會認為：「將這些多樣而豐富的產物運到別處加工製作，然後再運回來以大大高過原產品的價值賣給我們是十分不公平的事。」

到了一八八六年，巴馬西達當選總統後實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他的見解和措施有下列的幾項要點：

（一）注重本國工業的發展：主張進行公共工程來幫助發展本國的工業，撥款幫助其初期的建立等。

（二）主張壓制進口，智利人用智利貨。

（三）主張適當的提高工人工資及福利等。

（四）防止外資公司的繼續擴張，但不干涉它們目前已有的經濟活動。

（五）打破英資在硝石礦的壟斷；力圖成立智利本國的硝礦公司，並規定其股權不得轉與外人。

當然，各階層的人由這些政策的得益是不同的。例如到了一八八九年春天，由於衆多的、遍佈全國的公共工程建設，工資有普遍上升的趨勢。失業因而減少而工人待遇有所改善。從前工人日薪七十分而沒有食物供應，但這時却升至九十分並每日有價值二十六分之食品供給。不過農場主們却要被迫付出高工資來招聘工人，否則其產品便不能及時收割。

到一八九一年，智利發生內戰，巴馬西達的政權被推翻，總統被迫自殺。兩種不同政策，代表兩種不同利益——向外國靠攏還是保護本國發展——在這裏激烈的衝突以致要用武力解決。而前者的成功必然使智利經濟走上更加依附性的道路。

反對改革的人就是那些大地主、礦場主、商人、富有的外僑、教會等。他們控制了智利經濟的絕大部分，並且也有很大的政治勢力。下面的一些事例很能說明他們的勢力情形：

（一）巴馬西達總統會說：「議會是腐化的巢穴。那裏有一個集團受外國金錢的支持而工作，並曾誘使許多人墮落……議會的力量不停的在醜行與個人野心間搖擺……」倫敦時報亦說：「議會主要是由英國的朋友——保守勢力與有錢階層的代表而組成。」（七月

二十二日，一八九一年。）

（二）一位在智利的美國官員亦對其國務院說：「……革命（指推翻巴氏）是得到英國在智利的僑民全盤同情及在許多情況下積極支持的……很多人都知道英國公司會慷慨的捐助革命費用。內戰的領袖們公開承認羅夫先生就捐了十萬英鎊。」

（三）倫敦時報有以下報道：「議會中的大多數及同盟者都得這個結論：與執政者們決裂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們認爲只要聯同所有地主、富有外僑以及教會勢力，推倒總統是容易的事。同時他們還得到海軍的支持，並以爲可以得到大部分陸軍的支持。所以他們毫不懷疑當革命旗幟揚起的時候，全國都會起來響應他們。但只有部分理想實現了。除了大地主、外國本國的資本家、硝礦場主及海軍外，其他人民全無反叛迹象，而十分九之陸軍是効忠於政府的。」

十九世紀社會的利益集團 (Interest Groups)

這是對當時的主要資本家集團的一些分析，從中也可以看到智利工業化失敗的一些原因。

、掌握智利經濟的是一個有力的資本家聯盟——是基於出口原料及進口製成品的共同利

益上的聯盟。他們的利益促使智利經濟發展適應外界，適應國際市場。這聯盟主要有：北方的礦物出口企業，南方的農、牧產品出口企業，中部的龐大進口公司。他們出售礦產農產而得到外滙，便購買礦場農場的用品、機器及消費品。

他們認爲智利的工業最少要效率高至能與外貨加上運費的價錢競爭時才值得發展。他們對外資也採取歡迎的態度。作爲喉舌的報紙 El Ferrocarril 會經說：「外國人所積累的財富不應引起嫉妒，因爲這是他們工作和智慧的合法果實。……我國未來的繁榮應從發展特別適合的工業中取得，所以無人能否認我們需要外國的合作——不論在資金上還是經驗和知識上的合作。任何愛國的人都不應反對外國的這個偉大因素。」

智利有一些工業資本家的確會爲本國工業化鬥爭。但當輕工業開始發展後，其中許多人都改變主意。例如：有一個輕工業家叫奧古斯汀·愛德華斯的，在一八八三年是工業發展會社的第一任總裁，主張「智利可以而且應該工業化」（見前文），但在反巴馬西達的內戰中，他開辦的銀行却大量捐助。他出版的報紙「愛爾·麥基利奧報」也前後改變了立場。直到了今天，這銀行和報紙是親美派的忠實支持者。

這些資本家集團的利益是與民衆的利益直接對立的。農場主們利用國會中的影響力使法定稅項微乎其微。蘭吉傅就會不滿地說：「只要將農產收入抽一成的稅，就可以足夠政

府的開支了。」又像地主們與貸款機構息息相通，以致大地主們甚至憑個人名譽便可借得款項以進行買地擴展之用。通貨膨脹是他們財路之一：因為當長期貸款要償還時，金錢已貶值得很多，所以他們實際所還的只是所借的部分而已！

二十世紀——落後的深化

二十世紀的智利是一個貧富分化、對外依賴更加嚴重的國家，經濟結構更加缺乏發展。這可以從下面的一些事實中得到證明：

（一）驚人的債務——在一九六七年中，智利出口所得為四億五千萬美元，其中要償付外債一億五千萬美元，流到外國的資金一億五千萬美元。即供政府運用之外滙只得三分一。而當時智利的外債及必須以美元償還之內債共達二十四億三千萬美元，利率九厘。如以年利百分之四計算及以二十年期淸償，則每年要付三億美元之鉅。這實在是不可能的。故此智利只有以新債償舊債一途而已！

（二）外國資本驚人的利潤——智利目前主要的出口為銅，而銅礦經營股權美國佔了百分之九十。至六四年，每年從銅礦的收入，美資佔百分之四十七，智利政府佔百分之三十五，工人只佔百分之十三。另外，美方公司計算所得時是以美國的紐約市場為標準，比

國際交投的倫敦市場價格每鎊少了美金二角。以六十年代早期的產量來說，這一點已經使智利每年損失了九百萬美元。還有，外資所得的利潤不是再投資在智利以發展智利經濟，而是調走了。例如美國的銅礦公司 Gran Mineria 在六四年的一億五千萬美元利潤中就調走了一半！

事實上，由二十世紀初至六十年代中期，據估計外資已在智利得到九十億美元之利潤。又如在六〇年，由於外資公司利潤外調等造成智利之外滙損失竟佔智利當年入口值的三成！

（三）出口貨受控制更深——目前銅礦幾為出口貨之全部，但出口銅礦比以前出口硝石與小麥更加不利。如以小麥出口來說，智利本身佔有生產設備；如以硝石來說，智利當時可獨佔世界市場，訂立較好價格。但現在銅礦的生產設備及出口、市場都控制在外人手上，而且其產量只佔全世界的一部分。（非洲銅產越來越有競爭力）

（四）本國工業發展顯著受阻——由於外貨充斥市場，本國工業發展緩慢。十九世紀時智利已可以製造生產設備，但到一九六七年左右，它的生產設備的製造仍只佔工業產值的百分之二點七，而百分之九十的工業設備要靠入口。雖然本國有充足的煤、石油及水力等動力資源，但燃料却要依靠進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由於外貨減少入口，智利工業趁機抬頭，所以在一九四〇至四八年內，工業產值銳增百分之八十，但戰後在一九四八至六〇年，只增百分之五十，以後每年的增值更幾近於零。但在大約相同的時期內，入口值却躍升一倍。（一九五四至六三年中，消費品入口增百分之八十五，生產設備入口增百分之一百二十），由此可見外貨比本國貨在智利傾銷有力得多了。

單以一九六〇年作估計，由於設備開工不足使智利損失總計達工業總值之百分之五至六，由於失業而引起之損失爲百分之十。

（五）農產依賴進口——從前智利是出口小麥及牲畜產品的國家，但現在智利却要大量入口食品。一九五〇至五四年，平均入口九千萬美元，一九六〇至六三年，平均入口已增至一億二千萬美元。（外滙只有四億五千萬美元），而且有繼續急增之趨勢。這些食品是完全可以靠本國供給的。故此進口不但消耗外滙，而且阻礙本國農業發展。事實上，舉六〇年爲例，由於農業設備投閒置散所引致之損失已佔國民總收入之百分之三！

（六）國內貧富懸殊，勞動階層生活惡化——首先，收入的分配在各階層是極度不均勻的。到了六四年，資本家地主們只佔人口百分之五，却佔了國家總收入之四成，佔人口一半之工人及商業職員只得收入之二成，佔人口百分之三十的農業工人則只得百分之五！

(其他爲城市中的中小資產階級所有。)其次，收入的分配在各地區也是極不均勻的，城市越趨發展而農村走向破落。原因有多方面：㈠工業過度集中於少數大城市中，㈡地主將其利潤大部分用在城市或外國，商人的活動也是在城市中的，所以其利潤也留在城市，㈢資本家們認爲將資金投在城市企業，作投機活動等賺錢比投資在農業更快。所以，由各地的生產所得利潤只有小部分作爲公共建設投資回各地去。還有一點，就是商人的嚴重中間剝削。在食物方面，據調查有四成是所謂「商業性費用」。在普通的工人家庭中，食物中的「商業性費用」竟可佔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

勞動階層生活十分顯著地日益惡化，例如在一九五三至五九年中，僱主的收入比率上漲而工人的則下降(由三成退至二成半)，此外通貨膨脹又使薪金的購買力下降。例如政府僱員的購買力指數就由一九五五年之一百二十二點減至一九六一年之八十二點。

二、智利的階級鬥爭情況

智利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較之它的鄰邦更久和更透徹，但這並不等於說它比鄰邦更爲工業化。從工業化這個觀點來看，在各拉丁美洲國家中智利也不是最先進的，只是居於中間的名次。但智利國內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抗却很尖銳的。

和其他一些受到美國海軍統治及威脅的拉丁美洲小國相比較，智利最低限度有一百五十年政治自治的歷史。

在智利的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出現了一些不平衡的現象。智利的民族經濟一方面逐漸發展，同時外國在智利的投資也穩步遞增，而後者對前者是有破壞性的。

在十九世紀後，智利的整個經濟體系受英國資本左右。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銀行集團收購了智利的銅礦，從而開始向智利經濟最重要的一環滲透。在一九二五年一個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領導的國際性「顧問團」重新檢討和制訂了智利政府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對於外國在智利投資是非常有利的。

這些由外國壟斷資本所操縱的最有利的經濟環節，不但沒有帶來國家資金的累積，還反過來通過超額的利潤，使大量資金從智利滙出國外。這就造成了智利今天經濟落後的情況。從智利滙回各外國投資者手中的利潤，是他們投資資金的好幾倍，相當於整個智利的國家財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智利的經濟摧殘相當嚴重。智利曾經是一個重要的農產品輸出國，大戰後，它開始從美國輸入基本糧食，這當然又使大量利潤流入一些美國企業的口袋中。

今天智利的經濟完全依賴原料的生產，主要是銅礦。此外還有供應國內市場的小規模的消費品和農產品的生產。由於財貿界完全被外國勢力滲透，在智利差不多找不到一個獨立的民族資本家。換言之，在智利是沒有大的民族資本家，有的只是買辦階級，他們只不過是北美洲大企業的助手而已。

美國的僕從

舉一個例子來說。在智利的上層階級中的首富奧古斯汀·愛德華斯是智利統治階層中最有權力的人，他代理可口可樂飲品在智利的銷售權，還佔有尼羅斯頓公司在智利的附屬公司股權的百分之二十。這所公司經營農產品生意，對智利的國民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也經營一所名叫「國際財務企業公司」的金融企業，這是洛克菲勒財團在智利的子公司，管理智利全國最大的二十五所大公司中的十三所。愛德華斯家族的物業還包括智利全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銀行系統，及一份可以和美國「紐約時報」的銷量和影響力媲美的報紙「愛爾·麥基利奧報」。在首都聖地牙哥以外的報紙都和「愛爾·麥基利奧報」有極密切的聯繫，因此這個家族也就控制了智利全國報紙事業。

其他智利財閥諸如耶利雅及森瑪雅所經營的紡織企業，則是完全依賴美國的財政信貸及機構供應。在智利可以說是沒有一間可以和美資企業競爭的民族資本企業，雖然有一些小型民族資本的紡織、水泥及造紙工業，但它們能存在是因爲和美資的壟斷企業完全沒有矛盾，美資企業反倒可以向它們提供貨品和信貸。

就奧古斯汀·愛德華斯本人來說，他飛往美國的時候，比他花在關心自己企業業務情況及設法將他的「企業王國」民族資本主義化的時候還要多。

智利資產階級已經美國化了。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長遠歷史的工人運動

從另一方面來看，智利工人運動具有長遠的和連續的歷史。到上世紀末期，超過半數

的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智利勞動者的大部分生產都是爲了供應市場而不是爲了生活的需要。由於智利有持久的議會政制和表面的社會安定，它被一些政治學家宣傳爲「拉丁美洲的瑞士」，但實際上，這兒是慘痛激烈的勞資對立的戰場。

硝礦工人最早備受外國勢力的奴役，在一八八〇年舉行罷工，導致一個包括工會及革命者的全國性運動。在一九〇七年，智利北部恩其克市的礦工發動一次有一萬名工人參加的罷工行動，並有可能蔓延到全國。已經深感到工人運動的威脅的資本家，於是派遣裝備有自動機槍的軍隊去鎮壓。在一次衝突中，超過二千名參加罷工的羣衆被殺害。

智利的大資產者同時使用軍事暴力和壓迫制度來達到目的。縱使外國資本勢力侵蝕了他們的實力，把他們變成附從的地位，但他們對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絲毫沒有放鬆壓力。雖然這些資本家只是那些幕後財團的傀儡，但在智利社會中仍然是擁有很大力量的統治階級。與此同時，飽受殘酷剝削的智利工人，從窮困與鬥爭中養成了高度的醒覺性。

和同期的美國工人運動一樣，恩其克大屠殺事件更加激發了智利工人組織工會的要求。但有一點和美國工人運動史不同的地方：就是智利工人及他們的子孫對這個事件都是刻骨難忘的。智利工人蓄意保存了這種美國工人所缺乏的連續性；每一個智利工人都以這些「戰役」作爲他們成立工會的開始。

工人們組織了共產黨

在一九〇九年李卡特巴倫(Luis Emilio Recabarren)組織了「智利工人聯會」(簡稱FOCH)。這是一個包括各階層人民及富戰鬥性的組織。在一九一九年「工聯會」參加了新組成的共黨國際工聯會運動，兩年後，李卡特巴倫及「工聯會」的一些積極分子成立了智利共產黨。智利共產黨是拉丁美洲唯一從基礎到意識形態都屬於工人的政黨。今天它仍然代表了很大部分的工人。

共產主義運動和工會的組織都是在同樣的領導下同時發展起來的。智利的工會較之很多其他國家的工會更富政治色彩，但它的共產黨有時候却是一個較傾向於工會聯盟性質的、工人政黨，而不是一個先鋒隊的政黨。歷來它常常只是反映了有組織的工人羣衆的意識而沒有發揮對整個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是共產黨在組織農民，尤其是瑪菩濟印第安少數民族的工作中失敗的原因之一。

李卡特巴倫和大部分其他工人運動的領袖差不多一生都在競選國會議員。在他看來這不是一種權宜性的「策畧」問題，而是以投票進行革命鬥爭的「戰畧」的一環。他不只相信工人階級可以透過選舉獲得部分權力，甚至認爲不必要在智利建立一個由工人掌權的國

家。

在李卡特巴倫領導下的智利共產黨雖則在意識形態方面有缺陷，但對智利工人階級的影響是寬廣而深遠的。在他死後，三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極左思潮時期，智共宣佈「共產黨人應該加入議會以便徹底破壞這個制度」，執行宗派主義的政策，使它嚴重的和其他執行較溫和政策的工人組織互相脫離而自我孤立起來。

「智利社會黨」是於一九三三年正值智利共產黨處於孤立的時期成立的。它由五個較小的工人組織聯合組成。這五個工人組織曾在羣衆的要求下帶頭成立了只有十二天壽命的「哥羅夫社會主義共和國」(Socialist Republic of Marmaduke Grove)，這個政權立刻受資產階級的聯合攻擊而潰散。

「社會黨」從開始就宣稱它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它明確的和第二國際的「階級合作論」政黨劃清了界綫，但和「第三國際」也有很多意見分歧的地方。亞倫德就是這個黨的創始人之一。他曾經說過社會黨和智利共產黨「有類似的哲學觀和原則，但它不受國際組織的限制，而會採取其他策畧以便於專門解決智利的問題」，這幾句話的意義，在實行上的表現結果是「實際效果」高於「理想」。

「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的勝利

在「社會黨」創立三年後，它和共產黨及激進黨組成了「人民陣綫」。在一九三八年，「人民陣綫」的激進主義者柏德杜·亞高利·雪特(Pedro Aguirre Cerda)在「麵包——土地——衣服」的口號下當選總統。

就像同期在西班牙和法國的「人民陣綫」的政府一樣，激進黨是聯合政府中的主力，人數最多，一般代表了民主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在雪特執政期間，其他兩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也獲得很大的發展，取得了百分之三十二的選票。自此以後，這兩個政黨聯合競選經常都能獲得選票的三分一，這差不多成了一個規律。

和一般的聯合政府一樣，智利的「人民陣綫」並沒有意思使智利的社會結構有重大的改變，而只是要防止工人的公民權利受到法西斯統治的威脅。在「人民陣綫」執政期間，工人的實際收入只是稍稍提高了百分之一，只有一個「民主政府」的目標能夠達到，而另一個建立「國民經濟自主」的目標就根本談不上。

雖然如此，由雪特及後來的安東尼奧·萊俄斯(Antonio Rios)掌政的「人民陣綫」政府確是訂立了一系列的社會法律，使得在雪特政權中當部長的亞倫德在四十年後能以不同

的精神和目的去引用。

「人民陣綫」即使在維護資產階級的民主方面，也沒有持久的成績。大戰後不久，它就瓦解了。在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下，維廸拉雅(Gonzalez Videla)於一九四七年當選爲總統，在他當選總統一年後，就革退了三位共產黨閣員，並宣佈共產黨爲一非法政黨。這情況一直維持十年的光景。

共產黨在被宣佈爲非法政黨後，繼續進行地下的組織活動及支持社會黨在議會方面的活動。在一九五二年，亞倫德開始了他的四次競選總統的政治生涯。

與此同時，人民在獨裁政權下的騷亂不斷的加强及擴大。在一九五七年社會黨與共產黨成立「人民行動陣綫」(簡稱 FRAP)，這個陣綫後來發展爲「人民聯盟」(簡稱 UP)。當時以學生和失業工人爲主的廣泛而激烈的示威，迫使政府恢復了智利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在一九五八年的大選中，亞倫德及「人民行動陣綫」僅以三萬五千票敗於極保守派的亞拉斯山德勒(Jorge Alessandri)手上。

在這幾年中，同德國和意大利一些類似政黨有連繫的基督民主黨(簡稱PDC)開始崛起，成爲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派的主要代表，他們提出一系列關於智利現代化，國家發展和社會改良的計劃，獲得了一些最「開明」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及農民中的特

權分子，特別是希望成爲獨立地主的佃農的支持，於是能以一個人民的政黨的姿態出現。

基督民主黨的改良主義

在一九六四年的大選來臨時，由於國內洶湧的罷工和示威怒潮，使腐朽的亞拉斯山德勒政權完全無力保持社會安定。爲了避免社會黨在選舉中獲得勝利，而自己一敗塗地，亞拉斯山德勒的「國民黨」（簡稱PN）轉而支持基督民主黨的候選人厄瓜多爾・費拉（Eduardo Frei）進行選舉。

費拉獲權時，正是在美國甘迺廸總統說服了拉丁美洲各個獨裁政權要及時作出改革而成立的「爭取進步同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的全盛期。智利統治階層在這時的抉擇不只是在「基督民主黨」和「人民行動陣綫」兩者之間任擇其一這麽簡單，而是要在改良主義道路或徹底改革的革命主義道路間的抉擇，這也就意味着全部囊括或前「功」盡廢之間的抉擇。

可以這樣說，基督民主黨的政策促成亞倫德的當政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民主黨政府爲了平息人民的不滿情緒，作出了一些讓步，因而更加强了人民的勇氣。基督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政策僅是些空談，但却激起了羣衆的反應。

基督民主黨答應成立國民政府，訂立社會法律，擴大工會組織，重新分配土地及消除失業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換而言之，是符合民意的新的一套。土地改革政策更是其中的重點。

爲了在農村地區形成一個穩定的小資產階級階層以防止農民過激的行動，基督民主黨提出了一個使一些只有小塊土地的佃農成爲小塊土地所有者的新方案，計劃初期是獲得一些進展，但不久就陷於停頓。雖然基督民主黨明白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和國民黨中最保守的上層人物包括農村中的大地主的關係極之密切，以致這個土地改革計劃無法徹底執行。在六年的時間內，只有約一千家大農莊被充公而已。

由於智利資產階級的力量單薄，所以一嘗試進行使經濟現代化及合理化的改革，就遭受到致命的打擊。智利的「進步」資產階級雖然佔多數，但因爲受到帝國主義的摧殘而非常的軟弱，不能夠衝破落後勢力的阻障，無能實現他們所寄予唯一希望的改革。初期，基督民主黨針對前任極右派而以自由主義的「新道路」的面孔出現，但到了任期中的時候，他們對羣衆的武裝暴力鎭壓，已不下於任何前任者。

美國全力支持費拉政府

費拉不論在政策上及意識形態方面都十足執行了美國國務院對拉丁美洲的計劃。在費

拉政權下的智利獲得美國的援助，按人口計多於任何一國。其中透過「爭取進步同盟」及美國的「國際開發署」(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兩個組織調撥到智利的大部分基金的目的都很簡單：從智利吸取更多的利潤。但這些援助更主要更直接的政治企圖是支撐費拉政權以免倒台。所以，智利軍隊獲得美國援助的比例是南半球之冠。而在這十年中，美國對智利的投資也增加了三倍！

在費拉政權末期，智利的經濟已崩潰到完全停滯的地步，國民平均收入每年均在下降，實際失業人數高達百分之三十。在一九六六年的一次軍隊鎮壓銅礦工人罷工事件中有九名礦工被殺害。翌年軍警聯合鎮壓了要求政府取消削減工資及禁止罷工的一次大罷工，在首都聖地牙哥街頭到處都有流血事件發生。

由於外資壟斷集團不斷地把利潤外調，智利的資金日形短缺，導致不平衡的工業發展，新機器的購置促成很多人(尤其是農民)的失業，但又沒有足夠的新職位來吸收他們，於是發展成一支人數衆多的失業大軍。這大量集中的長期失業、從未就業或經常失業的人口，生活在絕望的邊緣，充滿不滿的情緒，對社會的安寧構成很直接的威脅。

根據估計，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智利人口缺乏適當的居所，有些甚至完全沒有居所。第二次大戰發生前，一些無家可歸的家庭已經開始以一百戶到幾千戶不等之數組成集團，

在市郊附近霸地而居，與警察的衝突是常有的，但通常經歷幾次後，政府不得不讓他們留下來，因爲假如他們的居所完全被取締，必然會引起更大的不安。

貧民區的增長，與智利在經濟上的附屬地位是直接相關的。一部分是由於智利的整個經濟依靠價格起伏不定的世界原料市場，使工人失業的數字也隨之波動。在不景氣時，很多家庭被迫要霸地而居，政府爲了不欲使情況繼續惡化，就會向原有地主購買這塊土地，而這些地主大部分都是從事土地投機生意的。在情況好轉的時候，這些工人開始有些收入去修葺那破爛不堪的房子，同時也開始向政府淸還爲期二十年的購地貸款，這種情形維持了三十年。

但是在費拉執政期間，失業及住屋問題劇烈惡化原因當然是經濟的完全停頓。基督民主黨曾竭力爭取貧民區方面的選票，鼓動居民自己組織一些非政治性的（實質是親基督民主黨的）自助組織，使他們能依法行事。正如基督民主黨在農村所遭遇的情況一樣，這一套辦法也只得到反效果，貧民區居民開始更有組織、更强硬的提出他們的要求。

三、亞倫德是怎樣獲得勝利呢？

在一九六五年，智利南部康賽普西翁市(Concepcion)的「智利大學」，有一個由社會黨或共產黨退出或被開除的黨員爲主的集團，組成了「革命左派運動」（簡稱MIR）。創辦人以學生、教授及一些專門搞組織的分子爲主。這新組織立刻成爲大學中左傾團體的領導，迅速地進行組織及從社會的各個階層，尤其是貧民區中吸取新血的工作。而貧民區就成爲這組織的一個穩固基地，從這裏以後再向農村以至產業工人方面發展。

要想了解「革命左派運動」的發展過程，一定要從當時智利的形勢去觀察：一方面是因爲由社會黨和共黨所組成的「人民行動陣綫」在大選中遭到慘敗，而另一方面羣衆運動正處於萌芽的階段，這是促成「革命左派運動」飛快發展的因素。

在一九六四年大選前，亞倫德充滿信心，不但成立了一個「影子內閣」，還預備組織一次旨在慶祝和鞏固「大選」成果的羣衆大會。事實上這也的確是亞倫德最得選民支持的一年，所得的票數比各次選舉、包括六年後當選的選票還多。但是由於資產階級政黨聯合

起來(國民黨起來支持基督民主黨)對付他，結果使正處於崇高聲望的亞倫德慘遭挫敗。六年後，只不過因爲資產階級政黨容許三黨競選，亞倫德才贏得總統。

「選舉」行得通嗎？

一九六四年大敗後，大部分智利左派認爲利用選舉去爭取國家政權的策略是死胡同，另一方面，在這個時期人民不安情緒迅速滋長，「傳統左派」開始面臨基督民主黨爭取被壓迫羣衆的激烈競爭。面對這個情況，「革命左派運動」的創始人認爲需要一個新的政黨，這個政黨必須具有徹底革命性的理論和策略，能夠眞正贏得鬥爭的領導地位。

不過「革命左派運動」並不是一個政黨。雖然它的政治路綫是以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爲基礎。它的內部也包括了各式各樣的人，而這些人的托洛斯基主義、德拜萊主義(Debrayism)或極「左」主義和「軍事錯誤」終於導致了「革命左派運動」內部一連串的分裂。對一些人來說，「革命左派運動」的政治團結基礎只是對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共同否定，他們都認爲這些政黨都經已完全妥協了。

「革命左派運動」創始人當初不願意成立一個政黨主要有三個原因：他們認爲應當保持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多方面性，才不致成爲一個狹隘無力的組織。他們不希望在沒有基礎前充當先鋒隊。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希望減少工人政黨的數目，而不是另起爐灶。

革命左派組織認爲，既然大部分的智利左翼已組成一些具有鮮明馬列主義旗幟的政黨，而共產黨與社會黨幾乎領導了絕大部分的工會團體，只有透過鬥爭才能建立一個統一的革命政黨。雖然「革命左派運動」認爲已有的兩個工人政黨的成員及一部分領導人將會是新政黨的主力，但仍需要一個獨立的組織作爲核心及推動，這就是「革命左派運動」要發揮的作用。

新的戰鬥性

到六十年代末期，費拉政權的嚴厲鎮壓手段，已經使左派忍無可忍，工人和農民運動進入更激烈的階段，開始佔領土地和工廠。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已不復存在。

一九六九年三月，費拉政府採取一些瘋狂的手段，爭取主動。在費拉的內政部長親自指揮下，一批特別防暴警察飛到南部的蒙特港(Puerto Montt)，拆毀於一星期前由失業的建築工人建立的貧民區。這些由美國訓練的警察向在夢中驚醒的居民開槍射擊，又把他們的居所燒成一片焦土。

對於費拉這行動，即使一些親政府的分子也極爲不滿，可以說這是它衰亡的開始。基督民主黨從此也失盡民心。

事發後不久，基督民主黨內左傾的人士由於受這件屠殺事件的影響，宣佈退出他們的政黨而組織了「人民統一行動運動」（簡稱MAPU），費拉土地改革計劃的策劃人積奇斯·漢祖勞（Jaques Chonchol）是這組織的領導人。基督民主黨固然已被人民所唾棄，而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卻認爲只有法西斯手段才能控制羣衆的不滿，他們也不滿這個政黨。

就在同一年中，警察在康賽普西翁市血腥鎮壓學生運動，大舉搜捕及拷打「革命左派運動」分子，「革命左派運動」從此進入地下活動，這組織中的幹部大部分都是學生，他們被派到農村和貧民區去工作。自此，「革命左派運動」正式向費拉政權宣戰。

武裝行動

「革命左派運動」從三個方面開始它的武裝行動：一、武裝宣傳：奪取一些小市鎮或鄉村，召開羣衆政治集會。二、提高羣衆的覺悟性及募集經費的活動：刧掠銀行和超級市場，將所得款項用作進行羣衆工作，同時揭露大企業的罪惡行爲和這些刧掠行動的階級性。三、替赤貧的農民霸佔土地建造房屋；以武裝保衛工人的罷工行動和佔領工廠。

在這期間，由於「革命左派運動」沒有公開活動，也沒有放棄地下組織工作，所以沒有什麽史料。不過可以肯定，武裝鬥爭是這時期的主要工作，大部分的工作人員都在工農運

動中取得領導地位。從這些工作中，「革命左派運動」經歷了一個根本的改變，它已經從一個單純由學生和知識分子組成的組織發展成一個有羣衆基礎和有紀律的政黨組織。

雖然瑪菩濟印第安人只佔智利人口的百分之五，但却佔智利貧農的大多數，他們從來不歡迎任何外界政治力量的滲入，但「革命左派運動」的年青幹部與他們一起居住、行動和學習，却受到歡迎，雖然「革命左派運動」對費拉政權一直都沒有武裝奪權的威脅，但却發動了一個羣衆起義運動，使之成爲一個有紀律的隊伍。

人民聯盟的成立

在一九七〇年總統大選的籌備階段，共產黨、社會黨與其他非左派團體和政黨進行商談。在大選前一年，這兩個工人政黨和其他一些小資產階級政黨及組織在「四十點計劃」的基礎上組成了「人民聯盟」。

「人民統一行動運動」是這個戰綫的主要成員，它的很多成員都是從基督民主黨中轉過來的，他們取代了基督民主黨在土地改革上的地位。一度是人民聯盟支柱的激進黨，現在已經勢單力弱，只能做一些次要的工作，把反對買辦階級和他們的外國主子的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小店主、白領階級和專業人士與工農羣衆運動聯繫起來。但激進黨很快就分

裂成三個支派，一派是傾向於「人民聯盟」，一派是中間派，另一派則聯合了反對黨。另兩個很小的「人民獨立行動黨」(簡稱API)和「社會民主黨」(簡稱PSD)也加入了「人民聯盟」。在一九六四年「國民黨」和「基督民主黨」聯合起來擊敗了亞倫德。到了一九七○年，這種聯合已經瓦解，因而替「人民聯盟」登上政壇開了一條路。

這兩個極右派的政黨在大選中所用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國民黨的候選人是亞拉斯山德勒，他是一名主張用鐵腕政策恢復社會安定的老獨裁者。基督民主黨則支持左翼的雷多米拉羅·湯密(Radomiro Tomic)，他也仿效「人民聯盟」，宣稱要終止外國的控制，以及在智利建立社會主義。不過這個社會主義是賦有「基督及民主」精神的，就是以合作社及國營企業，來穩定工人階級和爲一些主要私營商業賺取利益創造條件，也就是瑞典式及南斯拉夫式的社會主義。

兩個鬥爭

關於大選，「革命左派運動」認爲這只「不過是動員羣衆的其中一種正式的方法」，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意義。「革命左派運動」本身沒有參加競選。它宣佈了一個「以革命性的方法動員羣衆」的政策，即是讓「傳統」左派參加競選，並認爲這活動方式和「革命

左派運動」的政策沒有衝突。「革命左派運動」的幹部則鼓勵羣衆大力支持亞倫德的競選。

基督民主黨打算從支持「人民聯盟」的左傾選民中取得一部分支持，以取得決定性的票數。一般相信亞倫德這次選舉的結果會比上次更糟，所以他們也沒有爲當選作任何準備。九月四日，亞倫德當選智利總統，當時他的驚訝不下於任何人。羣衆運動的深廣證明是比一般人的估計爲高。

亞倫德獲得了百分之三十六點二的選票，這還不包括因文化程度過低而沒有投票權的數目，這約爲工農數目的三分一。國民黨之亞拉斯山德勒獲票百分之三十四點九，而基督民主黨的湯密則只獲百分之二十七點八。

雖然亞倫德獲票最多，但還沒有超過半數，根據智利憲法，這次選舉須交由國會決定。在法律上國會可以任選其中一人爲總統，但慣例是獲最多數票的候選人當選。由於這件事，兩個執政黨之間的分裂情況更爲明顯。

大政客亞拉斯山德勒擬定了一個詭計：由國民黨和基督民主黨人把持的國會選他爲總統，他將接受國會的決定，然後重新舉行一次大選及辭職，這樣，因爲不許連任而沒有參加競選的費拉又可以在國民黨的支持下競選總統。

這本來是個十全十美的計劃。但是當國會進行投票時，基督民主黨支持了亞倫德，使他終於當選爲總統。

爲什麽會選擇亞倫德

國民黨與基督民主黨的分裂顯然不是一朝一夕間形成的，它反映了智利當時情況的一些基本事實。基督民主黨雖然是自由主義派，但基本上仍是資本家，爲什麽他們情願選亞倫德而不是它的「同盟」亞拉斯山德勒上台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基督民主黨的領導人肯面對現實，能屈能伸。當時人民極力要求成立一個反帝的社會主義政府，如果這個要求受到阻撓，內戰就會爆發。基督民主黨認爲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阻止羣衆的這種要求的繼續滋長。那就是讓他們在某種程度下獲得一些滿足。

基督民主黨事實上是隨時可以阻止亞倫德上台的，它大可以支持亞拉斯山德勒讓賁拉「復辟」的計劃，或者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九七〇年九月和十月的備忘錄對這個時期發生的事有很詳盡的披露。當時一名右派的軍事領袖羅拔特・維歐斯(Robert Viaux)計劃了一次軍事政變，

並且獲得「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和美國駐智利大使愛德華・哥里利(Edward Korry)的讚許。美國國務院起初是批准這項計劃的，但是到了最後一秒鐘，由於費拉拒絕支持這政變計劃，它亦拒絕提供實際的援助。

根據「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備忘錄的披露，曾因堅持軍隊除了保護國家憲法外，不應干涉政府事務而名著一時的智利武裝部隊司令萊因・雪黎特(Rene Schneider)亦拒絕支持維歐斯的計劃，因爲該計劃沒有獲得費拉的應允。不過雪黎特沒有設法阻止維歐斯。費拉對維歐斯的計劃亦瞭如指掌，但他也只是袖手旁觀。出乎意料之外，維歐斯第一步行動就是在參議院決定總統人選的前夕在一次拙劣的擄掠行動中殺害了雪黎特。

不過維歐斯的法西斯政變計劃沒有成功，他本人也遭到逮捕。

「人民聯盟」呼籲工人、學生和農民舉行大示威保衛選舉的勝利，聖地牙哥的街頭站滿鬥志昂揚的工人和青年，隨時準備在需要時就起來戰鬥。

亞倫德上了台

亞倫德會經披露，他和費拉就保證防止內戰發生進行了祕密會晤。「人民聯盟」與「基督民主黨」簽訂了一項協議，保證一切活動不會違反憲法。十月二十四日，在基督民

主黨控制下的國會以絕大多數票選擇亞倫德爲總統。

很明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爲了保護它在智利的特殊利益而促使維歐斯輕舉妄動。事發後一年，哥里利就被撤除美國駐智利大使的職位。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備忘錄也提到第二套計劃：美國和智利商人合作，破壞智利的經濟。這項計劃在亞倫德上任前不久就經已開始實施了。

亞倫德就任總統後，曾經支持他而反對國民黨候選人的基督民主黨，在國會中和國民黨組成了强有力的同盟，阻撓「人民聯盟」提出的任何法案，使它的計劃無法進行。這個反對黨聯盟是如此的緊密，其中的黨派之分已幾乎不存在。因此我們更禁不住要問，爲什麽基督民主黨要支持亞倫德爲總統呢？

對於智利的資產階級來說，保存資產階級的民主比完全排斥工人的政黨更爲重要。現在回顧起來，基督民主黨和國民黨之間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由於利益衝突而引起的眞正分裂，有的只不過是策略上的分歧而已。分歧主要是由政府組織的危機所引起。

當時要選擇的是讓亞倫德出任總統還是一場漫長的內戰，因爲沒有任何別的人能統治這個國家。

基督民主黨和它的外國顧問們均認爲如果能對亞倫德政府進行干擾和施加壓力（例如

在國會中加以反對或者發動小型政變），就可以把他擺佈。他們相信可以讓「人民聯盟」調理及更新智利的經濟、穩定工農的情緒，然後在時機成熟時把它終止。就算亞倫德不肯聽命，他們也有辦法把他收服。

四、亞倫德的身世和政治理想

亞倫德的家庭

薩爾瓦多・亞倫德・高辛斯(Salvador Allende Gossens)出生於一九〇九年，故鄉是智利的瓦以帕來索省(Valparaiso)。亞倫德對他的故鄉有很濃厚的感情，因爲他在那兒度過了童年，也在那兒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亞倫德出生於一個小康之家。有一點亞倫德常常引以爲榮的，就是他的家庭跟那些財閥們，一點都沒有拉上關係。反之，他的家庭一直都跟先進的政治路線結上了不解緣。在智利立國的早期，教育是完全受教會控制的。亞倫德的祖父，却創辦了第一所不受教會控制的學校。他的政治觀點很是先進，因而得了「紅色亞倫德」的封號。他父親和叔父，都屬於激進黨的左翼。一九三二年，在埃本力斯(Ibanez)的獨裁統治後，瑪默廸・哥羅夫上校(Colonel Marmaduke Grove)領導了第一次社會主義改革，可惜十二日後便被軍事政變所推翻。亞倫德和他的哥哥及叔父等，在軍事政變後都

被監禁，而他的父親剛好在這個時候病重。亞倫德申請出監獄去看望父親，這竟然是他和父親最後一次的會面，他的父親去世前告訴亞倫德：他最驕傲的事，便是給他的孩子們一個正派的出身，因爲他並沒有任何不義的財富遺下來給他們。在他的父親死後，亞倫德要爲社會改革而奮鬥的決心，已經牢固地打下了根基。

青少年時代

據亞倫德自己的回憶：影響他自己思想最大的，除了家庭背景及教育外，就是一個補鞋匠。當他還是十四、五歲的時候，時常喜歡徘徊在一個補鞋匠的店中，聽他發表意見。這位補鞋匠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他教亞倫德下棋，借書給他並時常和他討論人生的各種問題。除了借書之外，他還時常和亞倫德討論書中所引起的問題，亞倫德在這小小的年紀，便已經作比較深入的思考了。他的思想漸趨成熟，也可說是受了這位補鞋匠的啓發。

亞倫德完成了中學教育後，選擇了醫學的一門。在那個時候，醫科學生在學校中是最先進的一羣。十六七歲的亞倫德和他的醫科同學一同住在近乎貧民窟的區域，每個晚上，他們都擠在一個小房子裏，高談闊論，交換政治見解。他們一起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也一起去研究托洛斯基的著作。其中影響亞倫德最深的一本書，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

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直到他當了總統後，他還說這本書的見解很符合拉丁美洲的落後國家的情況。他一直都堅持：「帝國主義者是我們的第一號敵人」。走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他的腦中，早已成型。

就在這段學生時期，他已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在家鄉瓦以帕來索省，他創立了一個政黨，上山下鄉，不遺餘力的去宣傳他自己的政見。他曾說：「我對普羅人民，早在少年時代，便已在理智上有了親切感，後來有了眞正的接觸，自己更感到像是他們的一分子，要爲他們做一點事。我是搞政治的，我深知道要能眞正的爲民請命，一定要和人民十分親近。世界上很多的革命家，其出身大多是中下的家庭，他們有些未曾親自受過被剝削的苦楚，但是他們都能感覺到這些不平的剝削，所以永遠和被剝削者站在同一陣綫，對抗剝削者。」

中年時期

一九三二年，瑪默廸·哥羅夫曾經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這個政府雖然只支持了十二天，而亞倫德也沒有親自參與過，但這個政治運動對他的影響却是很大。那時他是學生領袖之一，在法律學系的演說中，大力支持這個社會主義的政府，這也是後來他被捕

入獄的原因。就在翌年(一九三三年)，亞倫德便和他的同志一起建立了社會黨，以後一直是這個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其實早在一九二二年，智利便有了一個共產黨，但爲什麽亞倫德要成立一個社會黨呢？他自己這樣解釋：「在創立社會黨的時候，我們曾經分析過形勢，覺得智利需要一個政黨，在理論及方法上，和共產黨一樣，都是用馬克思主義，但與共產黨有一點不同，就是不和外國的政黨有密切的聯繫。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亞倫德反對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縛束，他會這樣說：「每位領袖都應該踏實的去分析國內的實際情形，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所在。分析情勢後，每一個國家都應該用他們自己獨特的方法，去應付他們特有的情況。」

一九三六年，智利的幾個政黨在打擊法西斯主義及保護民主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成立了「人民陣綫」。一九三八年，人民陣綫選出了激進黨的雪特爲他們的候選人，在總統大選中獲得勝利，推行了一連串的改良措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改革。亞倫德那時才三十歲，但已是這個政府的一個部長了。亞倫德認爲智利這個時期的歷史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他這樣分析當時的成敗：「無疑的人民陣綫是有了一些進展，但我們必須知道，經濟上的依賴會導致政治上的附庸。人民陣綫時期的經濟還是受外國的控制，這樣是不能取得

政治上的解放的。經驗教訓我們，要取得國家的獨立，一定要和帝國主義國家鬥爭。一些南美國家的政府進行改革，都遭遇到失敗，就是因爲他們缺乏權力，而缺乏權力的主因，是在於他們容許外國的資本繼續控制了國家的資源，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取得經濟上的獨立。」所以，亞倫德在三十年後當選爲總統時，就把各種投資都收歸國有。

雪特總統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去世，人民陣綫也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衝勁和影響力。亞倫德則繼續在政壇活動。自從一九四五年被選爲參議員後，他一直是議會裏反對黨的發言人之一。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度，他被選爲議會的主席。

亞倫德的爲人

亞倫德的作風非常平民化，從來不擺起官架，而且充滿了精力。一位朋友追憶他競選總統時的情形說：「薩爾瓦多是從來不疲倦的。我們都會筋疲力盡，睡不着覺。在從一個城市駕車到另外一個城市去演說的路上，如果薩爾瓦多看見田裏有三個人，他便立刻停車，給他們一個演說，跟着回到車裏，轉身便睡着了。」一位記者追憶他在一九六八年和亞倫德見面的情形：「一九六八年，（古巴）哈瓦那旅店的一位電梯員把亞倫德介紹給我。那是一個早上，我坐電梯下樓，向一位穿長袖恤衫的乘客點頭後，便向電梯員打招呼。因

爲我到過古巴三次，所以認識這位電梯員。他向我說：『你認得這位參議員嗎？』當我搖頭時，他便轉身面向那位乘客，爲我們互相介紹，就好像我們都是他街頭的老朋友一樣。眞的，從十樓到大堂，我們輕鬆的交談，輕鬆得令我不能相信對方就是智利的議會主席。事後我說：『哦，這是因爲在哈瓦那呢！』一年後，我在聖地牙哥打電話到他的議會辦公室，他很快便接聽了我的電話，並約我四點鐘見面。他的會客室不大，坐滿了要見他的市民，他們都是並無約定時間的，不過亞倫德却一定會接見他們。他的辦公室很細小，在牆上懸掛了亞里伯特、意路亞及畢加索等人的信和圖畫，他很高興我對這些作品感到興趣，但當他談及這些大人物時，就好像這些人物跟哈瓦那旅店那位電梯員並無不同。他快要以左翼的人民聯盟候選人的身份競選總統了，我在聖地牙哥的朋友對此有點擔心，他們並不相信亞倫德會贏得勝利，但他們知道，只要亞倫德眞的出來，他們會全力的去支持他。亞倫德却一直保持樂觀的態度，令人對他信服。」

當選總統

七〇年度的總統大選，形勢有了很大的改變，由六個組織組成的「人民聯盟」推出了社會黨的亞倫德爲他們的總統候選人。「人民聯盟」的成員，包括有四個政黨：社會黨、

共產黨、激進黨和社會民主黨，另外加上兩個羣衆運動的組織：「人民統一行動運動」和「人民獨立行動」。「人民聯盟」跟三十年代雪特總統所領導的「人民陣綫」有什麽分別呢？亞倫德這樣解釋：「雪特總統所提倡的，不外是『食物、住屋及衣服』，其實只是一個人道主義的計劃而已，並沒有太大的社會涵義，更不可以說是革命性的主張。人民陣綫中，有一個突出的主腦黨——激進黨。但現在的『人民聯盟』中，並沒有一個突出的控制黨，我們只有一個突出的階級，就是工人階級；而且我們有一個主張社會主義的總統；我做總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革智利社會和經濟制度，打開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九七〇年的競選在九月四日舉行，亞倫德獲得最多的選票，右翼政黨候選人名列第二，而基督民主黨的候選人第三。因爲亞倫德並未能取得大多數票，所以總統的人選，便要決定給名列第三的基督民主黨了。最後的決定時間是十月二十四日，在這之前的漫長的五十日中，基督民主黨便要作出決定：要支持右翼的亞拉斯山德勒還是左翼的亞倫德。年輕的基督民主黨人對右翼的政黨並無好感，但黨內持重的領導人却不相信亞倫德會保留民主的制度，所以他們向亞倫德開出一個條件，就是要他接受一個「憲法保證」，才能得到基督民主黨的支持。所謂「憲法保證」，就是要穩固現存的民主制度。具體地說，就是要有組織政黨、新聞、集會和教育的自由的保證，還要有遷徙、選擇工作和參加任何社會團

體的自由的保證等等。這些條件全部爲「人民聯盟」所接受，除了一點，就是要軍隊作爲憲法的監護人。基督民主黨人同意把這一條去掉，於是「憲法保證」便在議會上被通過了，而亞倫德也順利的當上了總統。當別人問他簽訂這「憲法保證」是否爲必要時，他說：「在當時的形勢下，這是完全必要的。我仍然相信，通過『憲法保證』是正確的行動，因爲我們並沒有在我們原定的計劃中讓步。你若然處身在當時的情勢下，你一定會同意這是必須的戰畧。你想想吧！那時智利正在出現『恐怖運動』，這是敵人發動來攻擊人民的一個運動，發生於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智利的時候。基督民主黨人也深知如果他們不支持我們的話，智利便有內戰的危機，所以他們才提出『憲法保證』，來交換他們的支持。他們一方面說我們引起恐怖，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敢負起引起內戰的責任，就這樣『憲法保證』便產生了。如果你詳細的閱讀這個保證，拿它和我們的新措施比較，便會發覺我們提出的措施，一點也沒有改變。但藉此機會，我們可以當權了。」

敵人的搗亂

亞倫德眞的當選總統了，但是他的反對者及反對他的外國勢力却一點不鬆懈他們的反擊。在亞倫德當選前那漫長的五十天，以及他當選後的日子，搗亂行動不斷發生。他們計

劃的第一步就是合法的搗亂。大企業家們合謀把存款從銀行提出，希望引起擠提，搗亂智利的經濟，而一般報紙及公共媒介則大事渲染「馬克思主義的危險性」，就是前財政部長的演說，也不是以安撫民心爲目標，而是企圖加强人民的恐懼心理，繼這些半合法的行動後，第二個階段開始了。他們用各種卑劣的手段，爆炸公共建築物、房屋。甚至暗殺了一個守衛外國使館的警察，並且企圖把這些恐怖行動歸咎於人民聯盟的成員。後來他們又嘗試軍事政變，可是陸軍的大元帥雪黎特阻撓其事，結果雪黎特也被暗殺了。

亞倫德一貫主張，用合法的議會手法去進行鬥爭，所以在遇到敵人四方八面的圍攻時，他仍然是依法去進行，希望造成「我是守法者，他們是犯法者」的印象，以博得民衆對他領導的政府的好感。他這樣說：「他們這樣做是會自食其果的，甚至把我謀殺了，一點也不能阻撓歷史的進展，只會淸晰的顯示一個事實，就是反動派已經到了違反他們自己創造的法律的時候了。他們不能指控我什麽，因爲我保存了集會、出版、發表意見等等的自由。」但是也由於這些局限，他只能作出被動的反擊。當他知道有人要謀殺他時，他要求警察局長的保護，但他的要求被敷衍了事，最後亞倫德只好靠自己的同志作保鏢。有一次，反動派攻擊他的住所，當時他的房子只有一個警員在巡邏，而且這個警察是奉命不能開鎗的，結果亞倫德只得自己拿鎗來保護他的家人。又有一次，一位紗廠資本家企圖爆炸

他自己的房子，想以此爲藉口把資本撤離智利。亞倫德早知此事，並通知了檢控官，但檢控官不予理會，結果炸彈眞的爆炸了。亞倫德等紛紛組織示威及抗議，向司法部施壓力，結果雖然主謀人員的被控訴，但後來法官却判這些被告無罪省釋，最後更得以離開智利。

在謀殺陸軍總司令雪黎特的案件中，亞倫德及他的同僚曾努力搜集證據，指證一位右翼的「激進民主黨」黨人摩拉利爲幕後主使人之一，但最高法院却運用法例，不傳召摩拉利出庭作證，而摩拉利也能夠因而逍遙法外。

司法、立法、行政

亞倫德的當選，把智利的情形改變了很多。他說：「我們是一個勞動階級的政府，因爲我們主要的理想，是勞動階級的理想。剝削階級在政府內並無影響力，內閣裏的人選，都是受薪階級，其中四個更是工人。通過這個政府，大多數人民將會取代了從前的少數當權者。至於智利現存的資產階級國家形式，我們正盡力去克服它，去打倒它。」一位記者這樣質難亞倫德：「但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仍存在於智利。你其實只擁有了行政權，而沒有立法及司法的權力，也沒有可以用作爲工具的警察權力。法律及制度，這一切都不是無產階級的成果；憲法也是資本家創造出來的，都是爲了要達到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已。」亞倫德回

答：「你說得對，我以後會講及這點的，現在且聽我說一些話。記得我們在大選時說了些什麽話麽？我們說要在大選中得勝是困難的，但却並不是不可能的。大選勝利後取得政府權力這一階段將會更困難。而最困難的，是再下一步的建設，因爲我們要爲自己的祖國，打開一條簇新的、由智利人民自己開墾的道路。我們說過我們會在現存的憲法中尋找漏洞，爲將來成立新憲法——人民的憲法鋪路。爲什麽呢？因爲在智利我們是可以這樣做的：假如我們向議會提出一個議案，但遭議會否決了，我們可以把它交給全民投票決定。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我們建議議會不應再分爲兩院，議會否決了這個議案，但我們再來一個全民投票而勝利了。就這樣兩院制度便結束了，就像我們所提議的一樣。」對有關法律及憲法等的問題，那位記者也會這樣地問亞倫德：「直到現在（一九七〇年初），資產階級的法律還幫了革命的忙，但這樣的情形能維持多久呢？到現時爲止，資產階級的法律對資產階級很是不利。『人民聯盟』用這種處處守法的做法來對付資產階級是很有力量的。因爲我們要知道，智利是一個這樣的國家——有問題要解決時，他們會去找律師，不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他們會用軍隊來解決問題。但是，我們的階級敵人遲早會不遵守他們的法律，其實，這也早已發生了。確丁尼(Cautin)的地主把自己武裝起來，正在向土地裏的工人作武裝挑釁，大量的武器從外國偷運入境，危險的顚覆行動已經開始了，你怎樣去應付這些

情形呢？」亞倫德這樣的回答：「開始的時候，我們要用他們自己的法律去規限他們。跟着，我們將會用革命暴力去對付他們的反動暴力，因爲我們知道，他們將會破壞法律的。我一向都這樣說，在智利的情形，憲法是可以用不違反憲法的方式去改變，就是用全民公決的方法。另外一點事實，是比較令人困惑難明的，就是人民的法律並不是資本家的法律。舉例來說，資產階級的法律對那些佔有土地的人是很寬大的，因爲他們並不認爲這是嚴重的，反之，那些試圖奪回自己土地的人民在法律上却受到很苛刻的待遇。換句話說：法律並不懲罰那些佔有土地的人，但却要教訓那些要奪回土地的人。爲什麽會這樣呢？因爲從前地主們佔了平民的地，而土著的居民設法取回，因而便成爲法律的犧牲品了。資產階級的立法者從來沒有想到法律是可以用來對付他們自己的。現在，有些什麽事情發生了呢？現在擁有土地的是土著的居民，例如瑪菩濟印第安人，嘗試用暴力去奪回土地的却是地主，因爲他們的土地擁有權已被剝奪了。於是，他們受到他們自己的法律的壓力了。當然，仍有些情形未如理想，例如最高法院的判決。」記者問：「但是法庭也是落在他們的手裏呢！」亞倫德回答說：「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如此。我可以告訴你其中一件事，最高法院最近給予了人民一個打擊，因而也打擊了政府。在雪黎特將軍被刺殺案件中，軍事法庭的代表都以爲某議員應被傳訊，因爲有足夠的證據去懷疑這位議員的所作所爲，但是最近

高等法院宣佈這位議員可以免受審問。上訴法庭的法官，以幾乎一致的票數（十七票對一票）同意軍事法庭的建議，但却被高等法院內的多數推翻。這個高等法院，一直都被批評爲以階級偏袒的立場來執行它的職責。在這個事件中，他們阻止了揭發那些反動陰謀的詳細緊密的研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止要把行刺陸軍總司令的兇手找出來，而且一定要找出那些幕後的主腦人物。」

不同的方法、相同的目的

亞倫德要推行的是社會主義，他常以爲每個國家應該斟酌自己國內的情況來計劃出自己的戰術。他到過古巴多次，和卡斯特羅及捷・格瓦拉等見過面。當別人問他古巴革命對他有什麼影響時，他說：「有很大的教訓呢！第一、一個團結的人民——一個深知道自己的歷史任務的人民，是戰無不勝的人民。還有，他們的領導人，要有責任感，要能明白人民的願望，要認識到人民就是政府。這幾點卡斯特羅和捷・格瓦拉都做到了。」他對捷・格瓦拉很是敬佩。他曾對人說，在他所見的大人物之中，他最爲兩個人所具的氣質所震懾，這兩個人就是捷・格瓦拉及周恩來了。他覺得他們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堅毅力量。捷・格瓦拉和亞倫德更是好友，前者曾把自己的著作「游擊戰術」送了一本給亞倫德，並親筆的

在書上題詞：「送給亞倫德——他要用不同的方法，來達到相同的目的。」

究竟亞倫德所用的方法，是怎樣的不同，下面節譯了一些亞倫德在當了總統後第一次在議會的演說。他談及了怎樣去推翻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並提出了在這個過程的五個要點：就是守法原則、建立制度系統、政治自由、防止暴力及生產工具國有化。亞倫德對每點都有加以說明，對了解亞倫德個人的政治理想，很有幫助。

克服智利的資本主義（節譯自亞倫德總統第一次國會演說）

雖然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和現在的智利情況非常不同，但都面臨了相似的歷史的挑戰。一九一七年蘇聯的決定在近代史上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他們相信落後的歐洲可以面對先進的歐洲，也相信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不一定要在工業勢力的心臟地區爆發。人民接受了這個挑戰，成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其中一個方法。

現在，再沒有人會懷疑一個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擺脫掉落後的局面，並且達到現代文明的最先進階段。蘇聯和中國的例子是最好的說明。

就像當時的蘇聯，智利正需要找出新的方法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多元化

的革命方法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預見但從來沒有被付諸實行的。社會思想家相信第一個能實行的國家將會是比較發達的國家，可能是意大利或法國，這兩個國家都存在有强大而傾向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

話雖如此，歷史却讓我們有機會擺脫過去的桎梏，建立一個新的社會模型。這不止是因爲理論上可以行得通，而且是因爲最有利的實際條件已經建立。今日的智利是地球上第一個實行通過遞變而到達社會主義的國家。

這個挑戰在國外也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每個人都知道或在猜測：歷史正在這裏開始了一個新的方向。這也是我們智利人民的見解。我們之中也許有少數人看到了這工作的艱巨。其他的大多數都盡量去看到成功的可能性。在我來說，我確信我們將有足夠的精力及能力來繼續我們的努力，建立第一個以民主、多元化、自由意志爲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

抱有懷疑的人及悲觀的預言家會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會說一個曾經爲統治階層服務得如此週到的議會，不可能轉化爲一個爲全智利人民服務的議會。

他們更進一步强調軍隊及特別警備隊一向都支持我們想推翻的社會結構和秩序，因此假如人民決定要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軍警將不會尊重民意。這些批評者忘記了軍隊及警備隊的愛國心、盡忠職守的傳統以及對民事當局的服從。

因爲國家議會是人民選出來的，所以本質上它是可以順理成章地變成人民的議會。智利的軍隊及警備隊忠於職守，並有不干涉政治的傳統。他們必然會支持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社會組織，而這種願望是完全合乎憲法的。對每一個人來說，這將會是一個更公正、更人道、更慷慨的組織，對工人尤其是如此，因爲工人一貫以來貢獻鉅大，但卻幾乎是一無所獲。

我們面對的困難不在軍警這一方面，而在於這樣的極端複雜的工作中：建立一個會導致社會主義的政治結構；並從現在的落後和貧窮的社會情形下（這是倚賴及發展落後所種下的惡果）開始；把造成落後的因素除掉；同時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爲將來帶來集體的繁榮。

落後的根源在於傳統統治階層的對外倚賴以及對內的階級剝削。他們藉着跟外國勢力勾結而得到利益，同時並在工人生產剩餘的分配上得到利潤。工人們只得到僅足餬口的報酬而已。

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破壞這個有束縛性及帶來畸型發展的結構。與此同時，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用它來接上前一個結構而並不是把前一個結構延長，而同時又能夠盡量保存生產及技術的能力；這些能力，是我們在落後的逆境中所得的成果。我們一定要這樣的去建設，不讓那些被奪去特權的分子搗亂。

除了這些基本問題之外，現階段的另一項重要挑戰是：怎樣在人民尤其是年青人中，培養出一種使命感，給生活灌以一種新的歡樂，給生活灌以尊嚴？

唯一的方法，是獻身於偉大而無私的工作。例如把人類的社會推進至一個新的紀元。直至現在爲止，人類的社會仍然劃分成特權階級和被剝奪者。今天，沒有人能想像，遙遠的將來的解決方法，那時各國都很富裕，物質充足，而同時又繼承了人類文化的傳統。那時將用什麽方法去解決各項問題，是我們今天無法想像的。但就在此時此地，在智利，在拉丁美洲，我們有機會亦有責任去發揮，尤其是年青人的創造能力，承擔起史無前例的使命。我們熱切地希望建立一個沒有貧富之分的世界，一個沒有爭名逐利、弱肉强食的社會。

人類很少像現在那樣需要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建立一個新的世界，新的生活。

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它給予了我們用以實現那個夢寐以求的烏托邦的物質條件。唯一阻止我們前進的是我們的貪婪、恐懼，以及過時的制度傳統。由現在到將來全人類解放的過程中，這些劣根性必須被克服。只有這樣，才可能把人類號召起來，創造新的生活；這不再是過往奴隸和剝削制度下的產品，而是一個能把他們崇高的潛力盡情發揮的

生活。這就是社會主義者的理想。

一些具有物質資源的發達國家的觀察者，會直覺地認爲上述的論點只是落後民族要找尋援助的新方法，不外又是窮人向富人要求施捨而已。事實剛剛相反，一旦由窮人作了社會的主人翁，一旦被剝削的國家能改變現有的國際貿易關係，貧窮和落後不僅會被取締，强國也不必再當暴君惡霸。就好像解放奴隸也同時解放了奴隸主人一樣，我們所預見的社會主義的成就不僅對貧窮的人有意義，對那些特權者也有意義，因爲雙方都拋開了使他們的社會蒙羞的枷鎖。

各位國家議會的議員們，我現在站在這兒，向你們大家呼籲負起這個任務，重建一個理想中的智利；我們的下一代可以生而平等，享有同等的醫療照顧、教育和營養。每一個男女的創造能力都得到發展，不是爲了要和別人競爭，而是要爲更美好的生活作出貢獻。

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節譯自亞倫德總統第一次國會演說）

要達到這些抱負，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並且需要所有智利人民的努力。其中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我們要能夠建立一個新形式的、多元化的、自由的社會制度。這個任務極爲複雜，因爲我們並無先例可循。我們正在走一條新路，要在沒有嚮導的情形下經過陌生的

地域，我們的指南針就是我們對古往今來的人文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文主義所具的信心。我們的目標是建立我們所要求的社會——一個符合智利人民願望的社會。

長時期以來，科學及技術所創造的生產系統都能爲每個人提供基本的必需品；但在今日，這些必需品只有少數人能夠享用。這種情形並不是因爲技術有困難，也不是因爲缺乏國家資源——至少在我國的情形如此。使我們達不到理想的阻力是社會的結構；是支配社會的各種利益，是依賴外國的國家所免不了的障礙。我們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基本的結構和制度上。

坦白的說，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擬定以及實行一個基於人民的需要及抱負而設的國家模型、經濟模型及社會模型，把智利帶向社會主義。爲了這一點，我們需要一些有決心有膽識的人，敢把世界重新安排來爲人服務。我們並沒有前車可鑑，爲了消除落後，建立社會主義，我們要在理論上及實踐上建立社會、政治、經濟組織的新形式。

要達到這些目標，我們必要面向着目標，不可以太過，也不可以不及。如果我們忘記了我們任務之一是要爲人類建立一個社會模型，那麽我們爲社會主義所作的奮鬥只不過是又一次的改良主義實驗而已。如果我們忘記了要脚踏實地出發，而企圖立刻創造一些我們能力之外的事物，我們也同樣會失敗。

我們正向着社會主義走，不是出於我們對理論體制有學術上的愛好，而是由於受到人民力量的鼓舞。人民知道要克服落後，這是不可避免的要求，他們也知道只有社會主義的體制才能讓一個現代的國家在自由、獨立和尊嚴的條件下合理的建設。我們正走向社會主義是因爲人民在自由選舉上揚棄了資本主義的體系。這個體系會帶來一個極端不平等的、毫無正義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破壞殆盡的社會。

在「用社會主義重建智利」的口號下，我們贏得了總統選舉，在市政議員選舉中也同樣地獲得了勝利。現在我們要以這個口號把人民動員起來，一方面以它作爲我們計劃的目標，也以它作爲我們行動的根據。我們政府的計劃就是人民同盟的競選政綱。在實踐這些政綱時，我們不會單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的計劃上而忽畧了智利人民現時的需求。我們的目的，不外是逐步地建立一個權力體系，使它能符合大多數人的願望，並且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滿足這一代人的迫切需要。

要幫忙解決龐大的人類問題，我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體恤人民的要求。要解決全人類的問題，必須先解決國家的、地區的和家庭的生活條件的問題。否則就都是空談而已。

對於那些喜歡偉大的承諾的人，我們的政策好像是太簡單了。但是人民需要的是過得去的房子以供家庭居住；他們需要的是好的學校讓孩子上學，每一天都有足夠的食物、工

作、年老或生病時的照顧、做人的尊嚴。這一切我們希望在可見的將來都能提供給所有的智利人民。幾百年來拉丁美洲人民的這些權利都被剝奪了。有些國家正在開始保證它們的國民可以享有這些權利。

但除了這一點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任務，亦是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使智利人民下決心，利用我們的手、我們的心及我們的情感，重建我們民族的本體，這樣才可以做主宰我們命運的主人，才可以繼承上代傳下來的技術、知識、藝術及文化，才可以成爲現代文明的一部分。把國家的注意力集中於這些基本的理想上，是滿足人民的需要和消除貧富之别的唯一方法。更重要的是，只有如此才能給年青人一項使命，讓他們去建設自己將來的社會；把他們對生存的看法，放在一個廣大的、有意義的視野上。

人民對我們的信托包括了國內的物質及精神的資源。我們已經到達了這樣的一個階段，無論後退或停滯不前都會替國家造成不可補救的災害。身爲對智利命運的主要負責人，這是我的責任，在現在這個時間，清楚地指出我們要走的道路及由之而生的希望與危險。

人民聯盟政府知道，一個歷史時期的轉移是決定於社會及經濟的因素，這些因素於同一時期已經形成，包括了歷史轉變的各種形式。忘記了這一點就會違背了自然的規律。

在這一段革命過程中的社會及政治工作上，我們將會集中注意基本的五點：守法的原

則、制度的發展、政治的自由、暴力的防止及生產工具的社會化。這些問題與每一個國民都是息息相關的。

守法的原則（節譯自亞倫德總統第一次國會演說）

守法是現今智利的最高原則。這是多代以來反對專制政治及反對國家權力濫施鬥爭的成果。只要統治者跟被統治者還繼續對立，這個鬥爭是不會停止的。

當前羣衆運動所反對的並不是守法的原則，而是以不公平的社會秩序爲基礎的法律系統。現在的法律標準及管理智利社會關係的機構都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爲依歸的。在轉變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法律標準會以正在全力建設新社會的人民的需要爲依歸，但守法的原則會依然保存。

我們的法律系統一定要有所修改。現在兩院的一個大責任是幫助而不是阻礙這個制度的改變。究竟議會是不是採取一種現實的態度，主要是看資本主義的法律會否被社會主義的法律所取代，來適應我們正在作出的社會及經濟上的改變，而同時又不會跟整個司法系統有嚴重的衝突，否則的話就會引起任意及過激的行爲，這是我們有責任心的人所希望避免的。

制度的發展（節譯自亞倫德總統第一次國會演說）

以法治精神組織和統治社會是我們的體制的固有物。羣衆運動和構成現時政府的政黨所作的鬥爭，爲國家帶來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局面。我們有一個開放的體系，那些要侵犯人民意願的人無法得逞。

由於我們的制度具有伸縮性，因此我們希望它不會成爲爭論的焦點。好像我們的法律系統一樣，這制度會根據新的需要，通過憲法程序建立起能夠推翻資本主義的新體系。

新的制度將會符合我們行爲所根據的原則。那就是要把政治及經濟的權力轉移到工人及全體人民的手上，爲了實現這一點，首先要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公有化。

與此同時，要調整政治制度以適合新的形勢。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會在適當的時機，向人民提出修改憲法的需要：把原來以自由主義爲基礎的憲法去掉，換上一個有社會主義本質的憲法，把二院制度改成一院制度。

根據這點，我們在政府計劃中承諾了在守法的原則下進行革命任務。這不是一個形式上的承諾，而是一個明確的表示，守法的原則及制度下的秩序與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是分不開的，儘管在過渡時期會有困難出現。

在這困難時期，要改變制度的階級基礎而同時維持這些制度是一項需要魄力的工作，對新的社會秩序極爲重要。雖然如此，能否完成並不能只靠我們的意志。還要看我們對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計劃，還要看短期的進展，也要看我們人民的政治行動能否符合現實。目前，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我們正在這假設上行動。

政治的自由

身爲羣衆力量的代表，我們必須記得：政治的自由代表了人民在困難的解放道路上所得到的成果。這是我們在剛剛過去的歷史階段裏所得的一項眞正的成果，所以政治自由一定要保存。因此我們尊重任何人的信仰自由。我們很高興引用聖地牙哥大主教對工人們的講話：「我代表的教會是耶穌的教會，而耶穌只是一個木匠的兒子。教會的開始就是這樣低微，但我們還是同樣愛它。可是有些人以爲它已經忘記了那卑微的出身，這是令人最傷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把自己局限於保持政治自由，我們便不是革命者。人民聯盟政府會加强政治的自由。單是口頭上說說是不足夠的，因爲這只會帶來失望及嘲笑。我們會使政治自由變得更具體、更實際，並且要眞正的推行。

社會上存在各種階級和集團，有着敵對的不能並存的利益；而在一個同一個階級或集團內，也存有不同的政治水平。這是人民聯盟政府擬定政策時的大前提，但這個前提有些人却盲目地拒絕接受。

在這繁雜的層面上，我們的政府所關心的是所有以自己的勞力換取生活的人的利益：包括了工人、專業人員、技師、藝術家、知識分子及白領階級。資本主義的發展使這些人的數目在增長，他們也因爲大家都是受薪者而日益團結。也因爲同樣的原因，政府會保護那些小型及中型的商業家，也就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地受到少數掌權者所剝削的人。

人民聯盟政府的多黨聯盟是符合這個現實的。與統治階級有利益衝突時，我們會用法律所規定的談判及協議手段。同時我們允許反對勢力的政治自由，也把自己的行動規限在法律的範圍內。政治自由代表了整個智利人民的成就。

身爲國家的總統，我已經完全採納了這些行動的原則。這些原則受到我們革命政治理論的支持；也符合現在國內的情形。它們已經包括在人民聯盟政府的政綱之內。

我們的計劃是要盡量發揮國家的政治潛力，有選擇地去取代現存的系統，摧毀及揚棄壞的、有壓迫性的一面，加强及擴大好的一面，逐步走向社會主義。而上述的行動原則就是我們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暴　力

智利人民在取得政權的過程中並不會使用武器。在走向社會解放的道路上，他們只是要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限制，而不是要打倒一個暴君或專制政權。我們的人民很合理地希望在蛻變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需要採取獨裁形式的政府。

在這點上我們的願望是很清楚的。但是要保證政治的演變會走向社會主義，這個責任並不只是在政府或者在組成政府的政黨及各運動團體的身上。現行的資本主義系統所加諸於人民身上的「合法」的暴力，人民已經頂住了，因此，我們正在改變這個系統的基礎。

我們政府的存在，是靠民衆意願的自由表達。而政府也只對這些意願負責。政府內的政黨及各運動團體指引了羣衆的革命思想，照顧到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直接向人民負責。

雖然如此，我有責任提出警告：解放的坦途上可能有一個危險的威脅，可能很嚴重的改變了我們集體決定的方向。這個危險就是用來對付人民決心的暴力行爲。

假如有暴力發生，不論是外來的或內在的，不論是經濟性的、社會性的、政治性的或人身等各種形式的暴力，只要它威脅到我們正常的發展及工人的成果，那麽我們制度的完整、法律的統治、政治的自由及多面開放的措施都會遭受最大的危險；那麽爲社會解放及

爲人民自由選擇權的鬥爭便只好採取另一種形式，而不能再走我們所引以爲榮的「智利式社會主義道路」。政府堅定的態度、人民革命的力量和軍警的民主決心會肯定保證智利是在解放的路上前進。

民衆力量的團結和中等階級的通情達理給予我們足夠的優勢阻止少數特權分子訴諸暴力。如果羣衆不受暴力所阻，我們便能把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改變成爲一個民主的、開放的及自由的社會，而無需使用武力、擾亂秩序和破壞生產，並且以一個由政府根據人民的需求及我們資源發展的程度所決定的速度進行。

生產工具的公有化

在當政以來中的六個月中，我們果斷的在多方面採取行動。我們經濟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消除阻止「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障礙。在當政以來的六個月中，我們奮力地推動了一些勢在必行的改變。

智利已經開始收回我們最基本的財富資源：銅。銅的國有化並不是對任何團體、政府或國家的報復或仇恨的行動。我們只不過是正面地行使一個有主權的民族的不可剝奪權利：充份地享用由該國勞力所開採的國家資源。收回銅礦是智利人民整體的一個決定，我

們要求所有的國家及政府尊重這個自由的人民的一致決定。如果是合理的，我們會付款收回銅礦，如果不合理的，我們將不會付款；我們會顧及到自己的利益的。但是我們也不會原諒任何人或任何團體的欺詐的、有害於我們國家的行動。

我們也把另外一個基本資源收歸國有：鐵。不久以前，我們跟伯利恒(Bethlehem)公司達成協議，鐵礦全部收歸智利國有。我們正在研究整個鋼業的結構，試圖把六間公司撥歸「太平洋鋼業」(智利國營公司)管轄。與北美工業界的協定更一再地表現出政府對外來的投資提供了合理的解決方法，而又沒有犧牲國家的利益。但是有些外國公司對我們法律蔑視及對管理當局不尊重，我們是不會容許的。我們也已將煤礦收歸國有了。

硝石資源也歸我們的了。根據前政府的一項協議，我們負了二千四百萬美元的債券，分十五年償還，包括利息在內，共要償還三千八百萬美元。北美集團理論上佔了價值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股份，所有這些，現在已經以八百萬美元贖回，分兩年償還。

我們又把很多公司國有化，包括了Purina，Lanera Austral，和The Bellavista Tome，Fiap及Fabrilana紡織廠。當供應受到威脅時。我們又徵用了水泥及紡織工業。爲了避免印刷公司破產，我們得到了色錫(Zig Zag)出版公司的重要的股權，它是出版業中的最主力部分。這樣新智利的文化需求就沒有問題了。

在所有被收歸國有的公司中，工人都在極力支持，生產量立即增加，工人、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都主動的參與管理及行政工作。這些事實全國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已經加速進行土地改革，並且已經完成今年計劃的一大部分：就是充公了一千家大農莊。土地改革是照現存的法例來進行的，中小型農戶的利益受到保護。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更鞏固、生產量更高的農業系統。我們要令到在農田上工作的人能夠公平的分享到勞動果實。銀行的國有化是有決定性的一步。在絕對沒有損害小股東的權利的情形下，我們已經在九間銀行建立了國家的控制，也快要在其他的銀行得到大部分控制權。根據以前的經驗，我們希望能和外國銀行達成合理的協議。我們想通過這些措施在財務機關裏取得控制權，並且在物質生產方面擴大國有化。我們要新的銀行系統爲國有化的事業服務，也爲中小型的工業家、商人及農人服務，他們迄今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五、打開通向社會主義的大門

亞倫德在一九七〇年的十一月三日上任，開始領導一個在智利史無前例的政府。

正如亞倫德自己說，通向社會主義的「大門被打開了」。沒有人會認爲亞倫德一當選，社會主義建設就開始了。人民聯盟雖然上台執政，但眞正的說來它還沒有獲得權力。雖然如此，有一個效果還是立刻看到的：國家的行政機關第一次不再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了。

亞倫德進入政府不是爲了進行改良而是要改變它。人民聯盟的策略是從內部把這個資產階級國家結構拆掉，然後逐步的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結構。

勞動人民可以通過這大門向前邁步，即使革命左派運動對議會選舉的勝利不大重視，但也承認這時期在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收穫，左派人士可以不受限制的去組織羣衆，爲他們當政做好準備工作。

人民聯盟的政綱答應實施五項基本改革：使智利的經濟脫離外國資本的控制而獨立自主，加强並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全面地實施土地改革，立卽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及重

建智利的經濟及政府以過渡向社會主義。

到了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智利政府已經收回了一度屬於甘迺洛地、安那哥達和巴拉德頓公司的銅礦，使這些外國公司失去了在智利最賺錢的企業。人民聯盟政府在原則上對收歸國營的企業進行賠償。但根據智利的法律，每年的利潤若超逾一成是違法的，所以歷年來各大企業所積聚的超額利潤必須從賠償額中扣除。根據這樣的清算，這些銅礦公司除歸還銅礦本身所有設備外，尚欠智利政府三億七千萬美元。

無論是「智利民族資本」或外資所擁有的銀行都一律收歸國有，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擁有的「萬國寶通銀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及梅隆(Mellon)家族控制的「倫敦銀行」(Bank of London)(一所美資公司)。政府開始將所有銀行合併為一間國家銀行。

智利的對外貿易絕大部分都改為由政府自己經辦。

煤氣、鋼鐵工業、水泥和電力工業都全部收歸國營。政府收購了煤礦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又接管由民族資本及外資經營的大型紡織廠。（紡織業是智利的主要工業之一。）

智利又正和美國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談判收購了該公司擁有的「智利電話公司」。

智利政府又收購所有大的捕魚工業，把它轉為由工人們經營的合作企業。此外政府也

開始接管分銷網的一切業務。

在人民聯盟當政的第一年末，智利的經濟基本上已經脫離了外資的控制，再沒有外資的壟斷企業，也沒有可以左右智利經濟的外國資金存在。政府不欲干預那些用作發展新產品及新市場的資金及那些由外資經營的小型工業，在那方面仍存有外國投資。一些美國公司還從出售專利權及版權方面繼續從智利得到可觀的收入。

三種形式的經濟結構

智利政府根據所有權的不同，將它的經濟重組爲三個領域：

私　營：這主要是那些只僱用少數工人工作的小型工商業，由於規模小，當時還不便於由國家來統籌和管理，這一類的數目佔智利工商業的絕大部分。

公私合營：一小部分的企業是由私人資金和國家資金合作經營。通常這些都是由工人們經營的合作企業，它是由政府援助而從舊廠主購買過來的。

國　營：這類企業是直接由國家經營的。人民聯盟政府計劃把國內三萬五千間公司中最大的一百五十間收歸國有，根據人民聯盟的分析，這一百五十間大公司控制了智利的經濟。

根據以前哥羅夫及「人民陣綫」政府所制訂的但爲人忽畧或棄置的法律，智利政府有權參與及購買一切私營工商業。因此人民聯盟政府把大公司收歸國有的計劃無需經國會通過，否則的話，這項計劃必然會被否決，因爲國會中近三分之二的席位是由右派控制的。

由於在議會中得到數次的勝利，國會便大着膽子，發起並通過一項法案，把經已國有化的公司歸還原主，阻止國營經濟的形成。亞倫德否決了這個法案，但此舉是否合乎憲法，則成了左右派之間爭論的焦點之一。爲了緩和國會中反對派的壓力，人民聯盟放棄了把大約六十間公司的私有權奪去的計劃，使國營的和公私合營的企業數字分別減至五十三和三十八。

人民聯盟的左翼評論家認爲，這個退縮的行動會使很多產業工人精神上受到打擊。當時一部分的工廠所以國有化，是因爲工人把它們佔領了，並且拒絕復工，除非工廠的私有權被奪去。很多時這造成國家被迫擁有它不想擁有的工廠，但假如國家要工人們再爲舊老闆工作，正如評論家說，工人便會覺得政府拖垮了他們。

戲劇性的變化

在收歸國有或由工人們控制的工廠，行政上產生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每個工廠的生產計劃都是由工廠的五名工人代表和由五名行政單位或部門主管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制

訂。這個委員會在政府的綱領下全權管理這個工廠。委員會由一名政府委任的行政人員主持，他要直接向政府和委員會負責。有一部分部門主管是由他委派，有些則是由各生產單位選出來的。

各個生產部門都選有一個生產小組，它的工作是輔助委員會制訂生產計劃和指標，監督生產計劃的執行情況，和照顧工作環境。一般來說，生產小組的功能相當於工廠中的管工，但它的工作並不單純是在生產方面指導，在多數的工廠中，它的活動範圍還包括工人文娛活動、假期的安排、育嬰中心以至政治教育。

關於工會組織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差不多有半數的智利工人參加了「全國工人聯會」（簡稱 CUT），這個組織於一九五二年因爲舊的智利工人聯會解體而組成。每一間有多於二十名工人的工廠都可以組成一全國工人聯會地區支部及派遣代表參加全國總部。全國總部的領導組織以前是經過間接選舉選出，現在則由全國普選產生。

過去在大多數工廠中，白領階級和藍領階級有不同的工會。白領的工會通常都沒有加入全國工人聯會。亞倫德當政的第一年裏，在全國工人聯會的領導下，這兩類工會開始合成一體，白領和藍領的工資差別也縮小了。

在人民聯盟執政的第一年，全國工人聯會在法律上被承認爲工人階級的發言人。它亦

被授權可以直接向國會動議法案，及與政府一起決定工人的最低工資、退休金及其他的收入政策。

工廠中的民主運動

在工廠中，全國工人聯會開始推行民主化運動，男女得到同工同酬。紡織工人工會在多年前要在廠內設立托兒所的要求雖然被紙面上應允，但到這時這些要求才開始在各工廠中實現。在全國工人聯會新的協議規定下，僱用某一數目以上女工的工廠，必需設有托兒所，女工在上班時間可以獲得探望孩子的時間。

很多以前沒有任何醫療計劃的工廠現在都開設了醫療及牙醫服務了，並由工人選出「醫務諮詢委員會」負責管理。在比較大的工廠中，工會組織通過各種各類的交誼及政治活動把工人們團結起來。

從人民聯盟當政開首十八個月的經濟統計數字所得的印象，與美國資產階級報章所描述的可謂截然不同，後者給人的印象是智利經濟陷於混亂和崩潰。雖然還存在一些難題尚待解決，智利的經濟進展是異常迅速的。不過，智利雖然將會把它的經濟情況穩定下來及以社會主義的形式來建設國家，但它假如不走向社會主義，那它目前有些問題仍是無法解

決的。智利的經濟難題，無論從它的重要性或本質方面來看，實際上是政治性的。假如基本的政治問題——由哪個階級來執掌國家政權還沒獲得解決，經濟穩定就不能實現。

人民聯盟在當政的第一年實施一個刺激生產及改善收入分配不勻的經濟政策。在亞倫德上台前，一些工廠因爲感到全力生產無利可圖，所以只動用六成的生產能力。這時情況改善了，那些先前只進行一班八小時制生產的工廠已變成爲三班制的生產，總的工業生產量跳升百分之十三。國民生產總値在費拉政權的時代持續減退，現在却增長了百分之八點五，比政府的預期還要多。

工資收入迅速增加

政府用增加了的生產量來促進工人收入，達到史無先例的幅度。在亞倫德上台之初，工資增加達百分之四十，國民生產總値中工資及薪金所佔的百分比由五十一遞升至五十九（由於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實際工資是沒有此數的）。

在以前的各任政府期間，失業率是它們經濟停滯不前最明顯的跡象。在人民聯盟上台前，官方公佈的失業率雖爲百分之八點五，但有很多明顯的事實顯示出找尋職業的人數比這公佈的數字多出三到四倍。

亞倫德上台一年半後，失業率已被控制到百分之三點五，這數字包括了正式失業的和一些未列入統計的失業人數。由於智利勞動工人的分佈地點和需要勞動力的地點往往不能配合，這數字實際表示智利正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

政府在第一年執政期間所造成的經濟進展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人為的，因為政府只是簡單的要求所有工廠充分利用所有的設施進行最大限度的生產，而並沒有進行基本投資以保證在第二年亦可獲同樣的進展。

另一方面，私人業主因為對目前政治形勢有恐懼，所以在廠內不會作任何投資，反而盡量設法抽走他們的資金。這樣人民聯盟就面臨着一個政治難題：如何再來一個經濟飛躍的年頭呢？

開始的時候政府保證要使經濟立刻就增長，有些批評家已經認為在政府沒有完全控制經濟前，作出這樣的承諾是不負責的。現在政府又呼籲工人犧牲，不要求加薪而是全力去進行生產戰鬥。其實不管原因何在，只要經濟一有麻煩，責難一定落在政府的頭上。

脆弱的一環

兩個互相關連的難題是智利經濟最大的弱點。首先是智利非常缺乏外滙，這對於長期

需要大量進口基本消費品的智利來說特別嚴重。美國及其他外國企業當然拒絕接受智利貨幣。更糟的是智利積欠外債達四十億美元之多，以平均人口計數，是世界第二大的債務國家。在最近由智利召開的一次旨在爭取較好還債條件的會議中，美國帶頭想訂立一些條件，使智利在幾年內破產，幸好各債權國間也有爭議，使人民聯盟政府還是獲得稍為好一點的還債條件。

但是外滙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根據估計智利只存有爲數約五千萬至二億美元之儲備，這是不足半年之用的。在白宮的壓力下，美國及其他跨國貸款機構又斷絕給智利政府信用貸款，使這情況更爲惡化。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的汽車零件生產商拒絕接受智利入口商人的信貸狀，打擊了它的汽車工業，從而加深了它的經濟困境。

外滙儲備的短缺，又造成了通貨膨脹。智利幣對外幣的滙兌率直綫下降而消費物價却日益增加。通貨膨脹率有時候簡直難以想像：約在十年前智幣的購買力有一年竟然減了一半。在人民聯盟上台的第一年，它把通貨膨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九減少到百分之二十二。但在一九七二年初通貨膨脹率又開始上升。這種趨勢會眞正的威脅到智利人民的實際工資收入，因而會釀成一場政治危機。

資本主義設置的路障

要克服這種情況，只有實行嚴格的物價管制，但由於太多的資金是屬於私人的，這辦法根本就行不通。另一條路就是要做到完全不靠懷有敵意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可是實際上要把智利的對外貿易轉向社會主義國家是困難重重的，光是地理上的距離就已經是一項難題。智利絕大部分外滙收入是依靠它的銅礦出口，因此一九七一年世界市場銅價下跌使它遭到嚴重打擊。雖然之後價格稍爲上升一些，但這個市場是非常反覆不定的，而且由於製成品的價格一直比原料價格上升得快，這項交易永遠是吃虧的。要希望擺脫這種依賴性，唯一可行之法就是重建新的經濟結構，把入口貿易分散，增加對國內生產的投資，這樣才能夠結束有大量棄置耕地、而糧食要靠入口的新殖民主義化的國家的典型情況。從此看來，土地改革就不只是單純一個國內的問題，而是反對新殖民主義化鬥爭的關鍵。

六、土地的政策

據人民聯盟政府的農業部長積奇斯・漢祖勞說，在智利已經沒有私人大農場了。在人民聯盟上台前的六年中，基督民主黨只沒收了一千四百個農場。但人民聯盟只用了四分一的時期就沒收了二倍的農場。每一個農場主都需要把超出於一百九十八畝的耕地交出。

基督民主黨因爲在政治上和地主階級有聯盟，所以不能徹底實施它的土地計劃。人民聯盟則力圖在現存法律規範下把這個計劃修改。

基督民主黨的計劃是調整農業生產，以便能打入資本主義市場，更重要的是希望能造成一個穩定的地主資產階級。

基督民主黨其次是希望能夠減少農業資金大批地轉向其他更爲有利的行業。基督民主黨解散最大的農莊，並不是要摧毀一個敵對階級，因爲一度存在於智利的半封建關係早已被資本主義農業經濟所代替了，所以也就根本沒有封建式的大地主階級。但現在要使整個資

產階級劃一，就必須要以較進步的分子來推動較落後的。因此基督民主黨雖然決定取締大農莊，但均對他們給予補償，及准他們保有他們一切的資財，這包括一切機器、畜牲及房產。

在過渡時期，被沒收了的大農莊，改組成一種合作農莊（asentamientos）。那些在大農莊內本來已擁有小塊耕地的農民，（一般都比佃農生活好一點），組成一個合作社管理這個農莊，並使用每年農獲的利潤作爲付款向國家購買這塊土地。在頭三五年內，這些合作農莊歸國家所有，由政府負擔購買種子、農具以及農民日常生活費用的貸款。國家銀行和「土地改革局」（簡稱CORA）的專家負責決策。

這些合作農莊的目的不是去教導大家合作化，反之，它是要使富裕農民在技術和意識形態方面轉變成一個小資產階級。這樣經過幾年時間，這些合作農莊將以家庭單位加以重新劃分。

剝削繼續存在

雖然這些農民因而會擁有了土地，但他們仍然繼續爲資本主義市場而生產，因此也會繼續的被剝削。資本家們仍然以賤買貴賣而獲取巨額利潤。

絕大部分智利農民，包括那些沒有土地的僱農，那些經常在農村漂泊找尋工作的散

工，那些有小塊土地但不足以營生而需要到別處謀生的工人，他們都被摒在這項改革計劃之外。大量「爲他人作嫁衣裳」的僱農仍然存在。

人民聯盟上台後繼續把沒收的土地改組成合作農莊，並設法使這種做法有不同的意義。人民聯盟沒有任何法律權力阻止合作社重分它的產業，但它却從思想上和經濟角度上成功說服了農莊的成員們，繼續保持這合作單位的形式。此外，政府也試圖說服原來的成員，讓其他農民也加入合作農莊。因爲這樣可以促進生產，成員通常也樂意這樣去做。

除了擴展合作農莊的成員資格及減少成員間的門戶等級之見外，人民聯盟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所有制，並預期它會變成更爲普遍。這就是「土地改革中心」（簡稱CERA），在這些國營農場裏面，所有農人都成爲支取工資的工人。「土地改革中心」的成立，成爲了有關土地問題爭議的一個焦點。

「土地改革中心」是當時可行的最前進的經濟及社會組織形式。土地改革中心的工人支取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管理形式與國營工廠相若。與合作農莊不同之處就是再沒有所謂地主及普通農人之分。對婦女來說，合作農莊是屬於她們的父親或丈夫的，而自己是沒有地位的。但在國營農場，不論她們是在田間工作或從事於家務，都和其他成員地位相等。

國營農場是由多個合作農莊或快將被國家沒收的大農莊的成員自願組成。對農民來

說，它的一個主要吸引在於它可以結束孤立的狀況，並且可以建立比較完整的社會基層建設，例如是學校、醫療所及其他集體形式的組織。由於婦女所得的利益更多，她們是最主要的支持者。

在人民聯盟執政的第一個年頭，只有兩三個土地改革中心成立。人民聯盟聯合政府內某些黨派，特別是共產黨，認為農民的政治水平還不夠，未能接受這種措施，應該有一個私有制的過渡階段。他們認為假如這種國營農場大量成立，那些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就會感到政府有計劃要終止土地私有制度。事實上，基督民主黨告訴那些剛得到小塊土地的農民，政府將要把他們的一切都收歸國有。這種宣傳加强了他們的擔憂。

但事實很快就顯示，相當一部分的農民不但接受這種國營農場的形式，還主動的要求。在一些矛盾較為尖銳的農村地區，甚至要組織國營農場才能使局面穩定下來。最初，只有「革命左派運動」及由它領導的「革命農民運動」才支持廣泛地設立國營農場的計劃，但稍後社會黨及左派基督徒運動也贊成了。

農民把運動向前推動

雖然人民聯盟的土地政策有所規定，一些面積小於法律規定的農莊仍然經常被僱農貧

農所佔領，因爲他們自己的土地以前都被大地主吞併了。訂定的法律規定政府將不觸動小於一九八畝的農莊，共產黨和激進黨也堅持要保持這些農莊目前的所有權。共產黨認爲要爭取中小地主一同對付大地主，鼓勵他們繼續生產，就必須這樣做。

但是在智利來說，一九八畝肥沃的土地，已是一個相當大的農莊，可以養活好幾十戶人家，當然也包括那「坐享其成」的地主。由於面積超過一九八畝的農莊都已經被沒收了，這個規定等於要結束在農村中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使大部分農民仍然處於被剝削中的農場工人的地位。

「革命左派運動」號召沒有土地的農民、貧農和一些中小地主組成聯合陣綫，並且沒收一切大於九十九畝的農莊。它指責人民聯盟現行的政策，把貧農的利益犧牲給小資產階級，忽畧了農民運動中最富於戰鬥性的一股力量。人民聯盟的策畧分裂了農民運動，使最無產階級化的分子置於工人階級領導的聯盟外。

「革命左派運動」和「革命農民運動」要求人民聯盟實施另一套新的土地改革政策，沒收的行動要更加徹底，應從舊的地主手中沒收一切的產業，而且不給予補償。它們認爲假如農民仍須向國家付款，使國家可以向舊地主補償，這樣農民就仍然被剝削而大地主們却絲毫無損。更重要的是，它們要求立卽沒收所有超過九十九畝的農莊，因爲大部分智利

的農民都是在這類農莊上工作，包括「革命左派運動」相信是鄉間的先鋒隊的分子，即農村無產者。這兩個組織更加認爲解決無地農民和小農間的矛盾，建設國營農場是唯一的途徑。

策畧上的爭論

不過這牽涉到一個策畧上的問題。共產黨不認爲在這階段可以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恐怕這樣一來，會使農民倒向基督民主黨。「革命左派運動」則認爲目前的客觀形勢是可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且相信大多數農民都能接受更且要求這種社會主義生產形式。

人民聯盟擬定了一個在地方設立農民議會的計劃，但沒有完全執行。農民議會將負責土地改革計劃，決定哪些農莊需要及在什麽時候沒收，以及一切關於貸款和技術援助等問題。

農民議會將會和當時農村中唯一有法律權力的行政機關處於對等的地位，實際上造成兩個均衡的權力。當國家權力的問題解決後(卽現在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取消後)，這些農民議會將成爲農村中主要的行政機關。

人民聯盟計劃的農民議會進展得非常緩慢，而在許多地方更成徒具形式而已。在一些

地方，農民沒有組織議會的要求和甚至不感興趣，不過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南部的瑪菩濟印第安人區，農民議會則比較活躍，並且要求更大的權力。

兩種恐懼

我們不能說亞倫德政府拒絕給予農民們權力。在農村中，權力不是在政府，而是在地主和他們的反動地方政權手中。政府沒有採取行動，因爲有兩種恐懼。一方面它憂慮這可能超越了一般農民的政治水平，以致使右派勢力會把農民奪取過去。另一方面，鼓勵農民對地方政權反抗將會導致對整個資產階級政權的「攤牌」，而人民聯盟目前還沒有這個準備。

「革命左派運動」則持相反的論點，它認爲政府的計劃還未能滿足大部分農民的要求，並且在土地改革進行中仍然讓農民繼續被剝削，會打擊了他們的士氣。此外它又認爲人民聯盟不應以分階段鬥爭的形式來使農民的政治水平提高，而應以推廣國營農場、沒收大農莊和組織農民議會的行動來提高農民的政治水平，使他們獲得自治的經驗，提高自覺性，爲未來的工農聯盟取得國家權力做好準備。「革命左派運動」指責人民聯盟頂多也只是跟着農民運動的後面跑，在某個程度上人民聯盟還壓抑了農民中的最積極的分子。

差不多在每個問題上，人民聯盟與左翼的批評者都有類似的兩條路綫的分歧。不過無論怎樣，不得不承認人民聯盟在執政的首十八個月內的確給大部分智利人民帶來較好的生活，而且把智利的工農帶進了一個新的鬥爭領域，使他們第一次有機會進行一場有決定性的戰鬥。

一個秘密的報告

人民聯盟的經濟政策驅逐了大部分外國企業和嚴重的傷害了智利的大資本家。一個供基督民主黨內部專用的祕密報告指出，資本家並沒有遭受致命的打擊，也沒有無可挽救的損失。不過報告又指出，除非亞倫德下一步的行動被阻止或挫退，否則資本家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亞倫德給智利也帶來一點社會安寧，即使這是暫時的。在他上任前足以癱瘓智利經濟的罷工及造反的浪潮現在已經平靜下來。「革命左派運動」也沒有進行反政府武裝鬥爭。一些工業國有化和基督民主黨原有的土地改革計劃，都是基督民主黨可以接受的，因爲這對他們的利益沒有太大的損害。畢竟墨西哥在五十年前也進行過類似的改革，而今天，美國和墨西哥的資本家仍然享受着巨額的利潤。瑞典也是一個類似的例子，英國也有點相

像，但程度較輕。

可是基督民主黨所代表的不是一個眞正的資產階級，它還沒有一些發達國家的統治階級所具有的伸縮性。縱然資本主義在其他經濟環節中保持不受障礙，他們却不能容忍九十一個大企業被國有化。他們所關心的利益太單薄，太狹隘，所以無法照顧到理論上的階級利益。他們可以容許一些土地改革，但不能容忍農民動員起來。他們不能容許雙元權力中心的存在，更不能容忍羣衆作奪權的準備。

人民聯盟改革了智利。但它決不打算停留在這一點上。不過每向前推進一步，都是對工農羣衆的傳統敵人的挑戰。這種挑戰的代價可以是它一切的成果。

人民聯盟的左翼評論家認爲人民聯盟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制度內，已經走到了極點。由於無產階級本質上是最民主的階級，因此工人階級政黨可以把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和改良計劃推展到一個資產階級自己不可能達到的地步。

「革命左派運動」認爲目前的工作是嶄新的：不只要保衞工農在舊制度下的利益，而且要動員工農羣衆準備徹底的銷毁舊制度。它認爲不做到這一點，對工農羣衆進一步的鬥爭必然會形成一種累贅。

七、從不同的道路獲得權力

智利的革命還未算發生。由資產階級締造和藉以鞏固它們的既得利益的國家政權依然完整。資產階級無疑是遭到了打擊，但力量仍然十分強大。

在很多方面來說，它仍是有支配力的階級，它的法庭仍繼續不斷的陷農民於牢獄，它的警察仍對工人的鬥爭進行鎮壓，作爲資產階級國家的心臟的軍隊，更沒有絲毫的被觸動。由資產階級組織的正規武裝部隊的存在，勢必會阻礙智利社會主義的發展。

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權只能依靠具有階級覺悟的工農武裝力量才可能生存。

在智利，甚至是各樣「民主」措施都是資產階級製造出來以鞏固它們的繼續統治的。所謂工農的民主就是指具有處理他們生活的各方面的基本權力。從智利人民在長期間的議會民主政治下所得到的經驗，使他們認識到投票的結果並不會改變他們的生活。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也是馬克思本人用以分辨革命者和改良主義者的原則，就是工人階級若只是接收舊的國家機器，是不可能眞正掌權的。必須把控制國家的專制結

構徹底銷毀，並依自己的形象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社會主義民主不可能通過在舊有制度內選舉出一批新人建立起來。必須用一個以工農的要求和參與的結構替代舊有的。

國家政權的性質

人民聯盟的領導分子認為他們自己是馬列主義者，完全認識到資產階級國家的實質。從這點上說，他們並不是改良主義者，也沒有認為權力的問題已經獲得解決。問題是怎樣去解決？

無疑的，智利的革命鬥爭在人民聯盟政府的執政期間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正如一份經常表達「革命左派運動」的觀點的理論刊物宣稱：「人民聯盟政府把資產階級用大石和泥漿來封緊的大門敞開了」。這篇文章跟着指出，人民聯盟領導下的智利進入了一個革命的時代，工人和農民在最進步分子的政治指導下開始進行奪取國家權力的鬥爭。

然而亞倫德的政府也敞開了另一道門。社會主義政府的建立，使整個右派團結起來。不單止是一度是敵對的國民黨和基督民主黨現在聯合了，連那明顯地是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派也加入了這右派的陣營。他們團結的基礎非常簡單——肢解人民聯盟政府、瓦解民主權利及腰斬工人運動。

右派希望在盡量不造成分裂的情況下，保留舊的秩序，最好的辦法是使羣衆的鬥爭士氣低落，方向迷糊，用人民聯盟的失敗來證明「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

法西斯的威脅

如果這個辦法不行的話——左派是不會輕易這樣失敗的，那麽右派就再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明目張膽使用武裝恐怖手段。在歷史上所有的法西斯政權都是在資產階級政權遭遇社會主義革命威脅的情況下上台的。

曾經一度宣揚「基督教式」及「眞正智利式」社會主義的基督民主黨，現在却加入了那些要對共產黨人及猶太人進行集體屠殺的一伙。反對派已經撕下了自由民主的畫皮，它們的政策和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社會主義」也是同一貨色。如果人民聯盟政府爲右派挫敗的話，很可能跟隨而來的是法西斯主義。

這種憂慮已成爲智利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經過開首十八個月的執政後，人民聯盟政府的力量並沒有加强，甚至比以前還要羸弱。它犯了一些代價沉重的錯誤，有可能關係到它的存亡。

在人民聯盟上台一周年紀念中，亞倫德對集會的工人說智利已經「無需支付代價」而

獲得革命勝利了。亞倫德曾對記者說：當人民聯盟的計劃完成時「我們將會獲得眞正的權力——這是無可置疑的」。半年後，人民聯盟的一些計劃正接近完成的階段，有一些却處於停滯狀態，使大家不得不正視一些懷疑與質問，人民聯盟內部已經開始一場新的政治鬥爭。

組成人民聯盟的各個政黨和它們的左翼評論家都一致認爲，人民聯盟存在着一個基本的問題：它沒有把智利的廣大羣衆完全地動員和組織起來。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誠然，當政府號召人民羣衆支持它時，會有數以千計的工人和農民走上街頭。但是從這種充滿鬥爭性的街頭示威行動到一個有高度自覺性和準備戰鬥的人民的階段還須要跨越一個艱巨的大步。

當工人和農民團結起來及準備戰鬥的時候。他們是不可戰勝的。只不過因爲人民聯盟在羣衆鬥爭方面有它的弱點，才會被少數的右派威脅到它的生存。對於一個外國訪客來說，以下一點是使他最驚異的情形：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尤其是最窮的貧農、沒有工會組織和失業的工人，還沒有被組織起來進行革命鬥爭。這是人民聯盟的致命傷，而這點它自己是知道的。

這個缺點從七一年十二月那次由右翼黨派組織的「空飯碗大遊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次行動使到聖地牙哥市區變成恐怖地帶，武裝的右派分子襲擊街上及家中的工人及工會領袖，對工會及政黨的辦事處投擲炸彈及縱火。右派的用意不是要推翻政府——它沒有能力這樣做，而是造成混亂及流血的氣氛，使軍隊「被迫」介入。

人民聯盟拒絕了這種挑釁。它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使聖地牙哥地區交由軍方接管，後者禁止了一切示威及遊行集會，同時實行嚴格的戒嚴。負責執行這項緊急條例的將軍也就是幾年前下令對罷工工人大開殺戒的那一位。

在當時的形勢下，人民聯盟政府採取了它唯一可以採取的行動。它消除了右派製造騷動的機會，及在軍方還未變成不可控制前把軍方置於自己的控制範圍內。但是一個以工人階級政黨組成的政府卻只能用資產階級用以維護他們自己既得利益的工具去平息一場由智利特權階層所引起的叛亂，這足以反映政府的立場的矛盾。

人民聯盟的內部

在人民聯盟的內部存在着兩條不同的路綫。一條是共產黨的，另一條路綫只是這時才出現的。

共產黨及其他政黨的部分人士認爲現時工人階級的基本工作是領導一個全國性民主革命，以使智利能達到經濟獨立，消除民族壟斷集團及推廣傳統式的民主。共產黨更强調這項工作必須在進入另一較高階段的鬥爭前完成。又認爲工農應該和小資產階級聯合一起，爭取大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以孤立和擊潰壟斷集團及其帝國主義主子。

要實行這些政策，共產黨及它的同盟均認爲鬥爭應該在目前的議會政府內進行。這條路綫不是和平主義論調——共產黨多次重申它會不惜爲保衛大選的勝利而戰鬥——但對工會以外的廣大羣衆來說，這條路綫的意思的確就是說選舉是他們的主要鬥爭形式。

共產黨認爲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爭取中間分子——白領階級、一些手藝工人、小商人和中小地主和僱主，他們都已變成反對勢力的主要支持者。

雖然大部分左翼團體都同意可以和應該把小資產階級從大資產階級手中爭取過來，但是共產黨的左派評論者則認爲共產黨的策略會把人民聯盟的整個政綱修改爲適應這個階層的要求和需要，有時候甚至和工農的利益相衝突。雖然工人階級的政黨在人民聯盟政府中是最强有力的分子，這樣的政策却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使他們變成尾隨小資產階級的領導。

反對意見的路綫認爲工人階級應爲同時達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不建立社

會主義就不可能得到獨立和民主的，因此也不能有一個穩定的中間階段。意圖製造一個各派的均勢藉以保存現況是不可能的。工人和農民只可能在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團結起來。

「革命左派運動」對人民聯盟最嚴厲的批評是指責它拒絕動員工人階級和壓抑農民運動，以保存政府在小資產階級間的根基，這樣等於把最强有力的拳頭綁起來。人民聯盟對付右派攻擊的政策是這樣的游移不定，同時又堅持要等人民聯盟本身的力量鞏固後才可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一來就為法西斯主義敞開了大門。

根據社會黨的分析和一份自我批評的報告，它也持同樣的觀點，指出人民聯盟現在不把消滅資產階級和建立社會主義的運動向前推動，不單是一個錯誤，簡直是一項出賣的行動。

這一份公開了的黨內文件對鞏固派的論調提出攻擊。在當前强調鞏固實力，把整個工農運動的力量放在保衛已得的成果，而忽畧去把運動加以推廣和深化，是由於修正主義意識形態而產生的錯誤，它否定了階級鬥爭的觀點。文件又指出，這種政策所帶來的將不會是一個改良主義的社會，而是會使廣大羣衆鬥志低沉，力量分散，結果會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雖然把左派分子分成兩翼的是改良主義和革命的社會主義，但智利的問題却不是

要改良或是要革命，而是革命或失敗。

社會黨內部的爭論

雖然社會黨在分析很多問題時用的是馬列主義的觀點，它却不完全是一個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因此很難說它有一條明確的路綫。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加入社會黨，黨內在一些業務性和技術性的問題上還有一致的意見，但在意識形態方面根本就不統一。即使一些黨員也認爲它仍是五個政黨的聯盟而已。不過當時剛剛穩固了權力的領導層是屬於黨的左翼，是同情古巴和中國的革命的。

在某個意義來說，亞倫德本人是「在黨之上的」。他在黨的領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重。由於他二十七年來一直是黨的總統候選人，所以使他無須在黨內建立自己的手下。亞倫德的政治風格光明磊落，不偏不倚，在智利政壇中幾乎無人可以與之相比，可說是一個聯合陣綫的最理想領導人選。不過這些使亞倫德和他的黨善於結盟的因素，同時却也使智利最大的左翼政黨出乎意料的羸弱。

各政黨碰到的最大矛盾是：人民聯盟堅持要保持各個階級的聯合——即亞倫德所稱的「多元化的國家」。這樣國家就不足以代表工人，也不能取代工人政黨的位置。但是工人

政黨却又傾盡全力的去爭取和保衞國家政權。所以，在某個意義說來，羣衆是被忽視了，因爲工人政黨都在置身政府事務中。社會黨在它的自我檢討中强調了這種失責的行爲。

八、「革命左派運動」的情況

「革命左派運動」指出，阻礙勞動階級團結的主要因素是最強有力工業無產者（大部分是由共產黨所領導）沒有照顧到貧農、還沒有組織的佔總數大部分的工人、無家可歸的和失業的人的需要。人民聯盟爲了要和小資產階級結盟，恐怕一答應貧苦大衆的要求會使小資產階級感到驚恐與反感，因此就漠視了大部分的人民羣衆。

人民聯盟對待中型工廠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是這種策畧的最明顯的例子。總的來說，「革命左派運動」指責人民聯盟沒有認眞的面對存在於工人階級和工農之間的特權關係的矛盾。勞動人民的上層分子和地主及其他剝削者的聯盟只能加深這些矛盾，使工農階級的團結，根本不可能達到。

「革命左派運動」並不反對工業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但却不能同意革命鬥爭可以憑工會領導而取勝。換句話來說，他們認爲智利共產黨只反映勞動階級中最有組織的部分的政治水平，而沒有領導這整個階級，更不要說領導工農聯盟了。

在人民聯盟上台的首十八個月時間裏，「革命左派運動」已經從一個紮根於受剝削最深的羣衆中的細小組織發展成爲一個有廣大羣衆基礎的强有力的組織。它不斷地號召把羣衆組織起來進行鬥爭，認爲工農應從鬥爭中學習鬥爭。所以「革命左派運動」的羣衆陣綫負有兩種任務，即動員羣衆和把羣衆組織起來，爲奪取政權的鬥爭奠定基礎。

「革命左派運動」

在費拉執政時期，「革命左派運動」的基層是最貧窮的人。在康塞普西翁市的學生運動發生後，它的第一個羣衆陣綫是「革命無家者運動」(MPR)，通過這個組織它很快就在無家可歸而又通常是失業的工人爭取容身之所的鬥爭中樹立了勢力。

在農民方面，「革命左派運動」首先紮根於南部的印第安族的農民中，這些印第安人以前對任何的政治運動都是漠不關心的。縱然智利的工業無產階級已經有一段長遠的鬥爭歷史，工人政黨却從不能在農民中發揮影響力。農民一直沒有介入政治活動，部分是由於被右派勢力利用，部分原因是他們被遺忘了。

「革命左派運動」認爲，大部分被其他左翼政黨視爲沒有希望的小資產階級，實質上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完全可以有工人階級的意識。被派往南部農村工作的年青幹部發覺，

無產階級策畧立刻受到羣衆歡迎。

在費拉政權的末期，「革命左派運動」組織了「革命農民運動」（簡稱MCR）。在這個組織的領導下，一種新型的鬥爭在農村出現了。一些印第安族農民，他們的土地先前被人用非法手段從他們或他們的父祖輩手中搶奪去，經過多年的法律訴訟而毫無結果。這時，他們開始把自己分成小組武裝起來，直接奪回失去的土地。一些在還沒被列入沒收範圍內的農莊工作的農民也佔領了土地。在那些地主因預計土地會被沒收而破壞生產的農莊裏，農民也作出了同樣的行動，革命農民運動並且在整個南部區域組織了農民民兵。

「土地、工作和社會主義」

「革命農民運動」的要求不是把大農莊分成小塊的私人耕地，而是「土地、工作和社會主義」。那些奪取回來的土地，通常由原來在這塊土地上工作的和被大地主從這裏逐出的農民集體耕種。印第安人通常要求政府把他們的土地改組成合作農莊，並要求把這些合作農莊變成國營農場的一部分。大體上說，參與土地的鬥爭的，既有無產階級亦有小資產階級，但佔主導地位的思潮則是無產階級的，它在農民中扮演着領導的角色。

在人民聯盟執政十八個月後，土地改革計劃已接近完成階段，新的計劃正被提出來討

論。「革命左派運動」的計劃獲得廣大羣衆的接納，革命農民運動已經開始激烈地爭取對整個農民階層，甚至是聖地牙哥附近的農民的領導。

一九七二年一月，「革命左派運動」和人民聯盟在黎拉里斯省（Linares）的選舉中聯合起來。這是「革命左派運動」第一次直接參與選舉的鬥爭。在這次競選中，它的幹部下了很多功夫，而共產黨則很明顯地置身事外。人民聯盟的候選人對「革命左派運動」提出的徹底而迅速地沒收大於九十九畝的農莊，成立農民議會及設立集體和國營農莊等計劃，都表示贊成。這次競選中，人民聯盟中最活躍的主要政黨是左翼基督徒組織（簡稱IC），他們來自中農家庭，所代表的力量就是迫使基督民主黨實行土改的力量。因此，「革命左派運動」號召的那種階級聯盟就成爲事實。

錯在「極端主義」？

這次選舉人民聯盟的失敗，共產黨認爲是「極端主義」所造成的。「革命左派運動」和人民聯盟的左傾份子則認爲這是由於長期忽略了這個區的政治工作和沒有充分動員羣衆參與這次選舉。通過這次選舉也說明了這一類投票表決並不代表羣衆的意願，因爲中上階層最懂這一套，農民就不習慣投票，文盲的就根本不許參加。

「左翼基督徒」和革命左派組織的聯盟，繼續保持並且發展異常迅速。這一點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爲「左翼基督徒」是由前基督民主黨人和脫自基督民主黨的「人民統一行動運動」者組成的。目的是要把基督民主黨黨員及非政治性的力量拉進人民聯盟。在某種意義來說，「左翼基督徒」和革命左派運動的聯合證實了後者的觀點：羣衆運動應該由有明確鬥爭性的領導來推動，而不應該建立在一個落後於羣衆的計劃上。

至此，「左翼基督徒」、「人民統一行動運動」及「社會黨」都組織着强有力的農民運動。從這些運動中所得到的共同經歷，是促使這幾派日益團結的原因之一。

在工廠的活動

人民聯盟上台後，革命左派組織第一次可以公開在工廠中活動。一年後，它組織了「革命工人陣綫」（簡稱FTR），後者成爲全國工人聯會的一派。這陣綫在工業工人中有相當的號召力，它的候選人贏得了煤礦工人——智利傳統上最富鬥爭性的工人——和原來是由智共領導的幾間大紡織廠工人的工會領導權。雖然至此它還未稱得上對智共是一個威脅，但它至少經已提出一個有力的挑戰，使社會黨迫得也採取一個類似的政綱。「左翼基督徒」亦與「革命工人陣綫」結成聯盟。

「革命工人陣綫」號召把國內所有（大概三百間）價逾一百萬美元的工廠收歸國營（這計劃本由人民聯盟提議，不過後來取消了），並在還不能由國家經營的工廠成立工人合作社作爲過渡形式的組織。它和共產黨的立場主要分別地方，是它認爲只有屬於工人的國家才能建設社會主義，並認爲即使有部分公司已收歸國有，但只要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然存在，工人就會仍然受到剝削。他們認爲由共產黨提出的「打生產的仗」是錯誤的，工人階級要爭取的應是國家政權。

在某個意義來說，「革命左派運動」比其他任何左傾組織更能從人民聯盟獲得好處。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在於主張鞏固人民聯盟已有的收穫而不是將步伐加劇，極左派的錯誤則是在於否定了勞動階級在人民聯盟當政時期可以獲得的巨大成果。人民聯盟不能建立社會主義，但可以使羣衆爲鬥爭作出準備。

人民聯盟的前途的關鍵在於它內部能否湧現出一個以革命策畧爲指導的、勇敢而果斷的領導階層。如果沒有的話，那不但會打擊羣衆的士氣，更會造成致命傷。正確領導的潛力是存在的，可是它發揮的時候，共產黨和它的小資產階級的同盟也會爲它製造很多障礙。這樣的關係是互爲因果的——只有這樣的領導才會採取主動，也只有羣衆的鬥爭才能改變人民聯盟內部各種勢力的關係，使這樣的領導能夠誕生。

「革命左派運動」有一條和改良主義和失敗主義絕然相異的政治理想，但它還不是一個政黨，也還沒有一整套的政治綱領。

共產黨承認有危機存在

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共黨總書記在一次演說中坦然承認共產黨和人民聯盟左翼人士出現愈來愈大的意見分歧。他說：「我們深信(人民聯盟)當前確出現路綫、方向和領導的危機，這些危機不可能背着人民去解決，不可能在羣衆完全不知情、也完全不參與的情況下去解決。」

但是共產黨却否定了「革命左派運動」有關建立一個具有原則性的革命力量統一戰綫的號召。共產黨排除聯合「革命左派運動」的一切可能性，並宣稱它們彼此間的分歧，是工人階級和它的階級敵人之間的分歧，因此沒有商談的餘地。

兩條路綫的鬥爭會繼續在羣衆運動中進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只會加强羣衆運動和糾正勞動階級中錯誤的傾向。短期來看，分裂羣衆的人却會助長了眞正的階級敵人的力量。

九、軍事政變

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了亞倫德政府在政治、農業和工業各方面的一些政策。以美國爲主的外國壟斷資本集團在亞倫德的國有化計劃下，損失了一筆可觀的資產。智利的一些大資產階級也喪失了對一部分工廠的控制，收入因而銳減了。在農村及其他地方，富有地主的土地被國家沒收了。這些人都不會甘心損失的。

人民聯盟的當政是由於智利兩個大資產階級政黨的意見和利益分歧的結果。然而亞倫德當選及登上政壇後，這兩個大政黨——國民黨和基督民主黨——立即和好如初，共同對付亞倫德的「人民聯盟」政府了。

正如前面也討論過，他們利用在國會中的多數席位和它的輿論喉舌去阻止亞倫德繼續推行他的政策，因而有了所謂智利民族資本的銅礦可免受國有化的憲章修改法例。

亞倫德實施國有化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的美國壟斷集團是最不甘心的。這點可由美國政府的一些行動反映出來。它一方面要求智利淸還外債的利息；另一方面，則運用影響

力使「世界銀行」、「出入口銀行」、「美洲內部發展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停止對智利援助和貸款。此外還通過國際貨幣基金阻止一九七二年初有關智利外債的巴黎談判重開。

銅是智利的出口貨物，是智利外滙的主要來源。美國在世界市場施加影響力，把銅的價格壓低(從每磅六十四美仙下降至四十九美仙)，這樣一來，不獨智利的外滙嚴重減少，也打擊了智利銅礦業。智利一向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這一連串的經濟壓力，使得智利一時措手不及，無法獲得足夠外滙，以購買工業物品、食物和其他一些消費物品。在國內外兩種敵對力量的夾擊下，智利工業生產停滯，物資缺乏，通貨急劇膨脹，至一九七二年底通貨膨脹暴升百分之一百六十四，經濟情況異常惡劣。

雖然智利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亞倫德的聲望並沒有因而下降，他仍受工農羣衆的支持。一九七一年三月的一次市政選舉中，人民聯盟獲得了百分之五十點九的選票，基督民主黨只得百分之二十五點六的選票。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的國會選舉中，亞倫德的人民聯盟獲得了約百分之四十四的選票。反對派的聯盟只能獲取百分之五十六的選票。這比基督民主黨先前估計的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或在議會中有足夠新的席位彈劾亞倫德總統的預期爲低。相反，亞倫德的政黨在參議院奪取了兩個新的席位，在衆議會得到六個新席位。

這對反對派來說，以「民主選舉」手段擊敗亞倫德的路行不通，看來只有使用暴力手段來對付亞倫德的政府了。

軍事政變的導火線

亞倫德的國有化政策，只是影響國內外的壟斷集團和一些大資產階級。對醫生、工程師、小商人、卡車車主、教師等人的影響微乎其微。

智利的工商業活動和農產品的運輸主要依靠公路貨運。亞倫德根據制訂的政策，按計劃把運輸業國有化。這計劃影響到卡車車主的利益，因而受到他們相當程度的反對。與此同時，智利一些右派團體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煽動這些卡車車主實行罷工，並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使卡車車主能進行長時間的罷工。有些車主更直接了當的承認，這比上班賺的錢還多。這次罷工由七月廿六日開始至九月十二日，延續了七個星期。由這次罷工造成了城市的食物、燃料的短缺，惡化了失業情況，影響所及，其他一些專業人士，如醫生、工程師、教師和一些小商人也加進了這罷工行列。他們指責亞倫德政府政策失當，致有嚴重的通貨膨脹、物資短缺。顯然，右派成功地把智利中間階層的憤怒矛頭引向了亞倫德的聯合政府。

與此同時，基督民主黨及國民黨於九月四日號召商業、運輸業及各行業公會進行無限期的罷工。九月五日，一些右派團體在首都聖地牙哥煽動它的數萬名婦女支持者，舉行集會遊行，向總統府進發，要求亞倫德總統辭職。此外國民黨亦慫恿罷工者向國會請願，要求於九月十三日彈劾亞倫德總統。

右派除了煽動罷工外，也進行一些恐怖活動。到八月中旬止，超過二十人被謀殺。他們襲擊及破壞火車和公共汽車，車站和鐵路。有兩處主要輸油管也遭到破壞。在八月十三日的一次行動最爲嚴重，恐怖分子破壞了很多座高壓電力塔，使到智利有八個省份有幾小時斷絕電力供應（根據政府一項估計，如果恐怖分子的計劃全部完成，智利最少要有一個月時間沒有電力供應）。情況是這樣惡劣，政府差不多已陷於無能爲力的狀況，沒法控制整個局勢。亞倫德正在向全國廣播揭露右派陰謀時，突遭停電，使他沒有完成這個廣播。這件事可反映出政府所遭遇的惡劣情況是多麽嚴重。

武裝部隊並不支持亞倫德的左傾政府。武裝力量傳統上都是用以保衞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右派勢力的聯繫多於和左派勢力的聯繫。這種聯繫又因爲軍隊的領導層絕大部分都來自中上層和上層而更加加强了，雖然武裝部隊中的一般陸軍、海軍和空軍戰士是大部分來自農村和一小部分來自城市的勞動階層的。由於右派勢力的羣衆基礎是

如此薄弱，它不得不依賴軍隊去保衛它們的利益。

配合着右派的囂張勢力，智利軍隊展開對人民的挑戰。在八月廿二日，國會內的國民黨和基督民主黨通過了一項公告，指責人民聯盟政府嚴重違反了法律及憲法秩序，並要軍隊介入指導政府的行動。

其實自八月中旬以來，軍隊已控制了南部各省的重要地點。軍隊無視人民聯盟政府，對國營工廠和農場進行暴力的武裝侵擾，無日無之。在首都聖地牙哥地區，軍隊藉詞搜查武器，拘捕工人、農民，並施以酷刑。八月三十日，南部高廸添省(Cautin)一個國營農場被空軍的三架直升機侵入，士兵又以搜查武器爲名，把一名農民施刑致死。九月七日軍隊又包圍一間名爲森瑪拿(Sumer)的國營紡織廠，有三名工人遭受重傷。

與此同時，智利全國駐軍於九月一日下令戒備。在軍事政變前數天，美國和智利的海軍，曾經進行海上聯合演習，軍事政變已如箭在弦，只待一聲命令而已。

九月十一日晨早，海軍及陸戰隊佔領了首都附近的幾個大城市。亞倫德總統在總統府向全國廣播，透露軍隊要求他辭職。亞倫德聲稱決不辭職，「我決不辭職，我將不惜一切進行抵抗，甚至犧牲我的生命」。陸軍和警察於是包圍總統府，受到總統衛隊的英勇抵抗，軍隊出動坦克和轟炸機襲擊總統府。到中午時刻，軍隊攻進總統府，亞倫德自殺的消

息於是傳出。後來的消息則說亞倫德在總統府衞隊和民警的支持下，英勇的抗戰政變軍的攻擊達兩個多小時，直至不幸的犧牲。這項消息後來得到證實。

軍事統治下的智利

軍隊雖然佔領了總統府，亞倫德總統也壯烈犧牲了，但支持亞倫德的智利人民則紛紛拿起武器抗拒軍隊的鎮壓。雖然他們和有現代化裝備的軍隊來比較，實力是非常薄弱，這却反映出人民對軍事政變的不滿。

政變後，由海、陸、空三軍和警察力量的首要組成四人執政小組，宣佈智利全國戒嚴，禁止人民舉行集會。這個四人執政小組於九月十二日關閉國會，宣佈一些有進步傾向的政黨爲非法組織，解散擁有數十萬會員的全國工人聯會。

在首都聖地牙哥有約一百名左派領袖被拘捕。亞倫德政府的三十五名部長和總統的顧問也被軟禁在智利南部的一個小島上。首都的國家體育場被用作爲臨時的拘留所，約超過七千人被囚禁在內，他們大部分是工人、左派羣衆和一些來自附近國家的政治難民。據一些通訊社的報導，有一些人在國家體育場內被處決。有四名諾貝爾獎得獎者在九月十七日聯署請求聯合國方面派遣觀察員，以保證這些被拘捕的人的安全。

在這次軍事政變中，有很多人喪生，據智利國家醫療機構在十月四日的報告，有五百人死於槍擊。但一般估計(保守的估計)死亡人數約爲二千之數，可能高達二萬之多，不過眞實的數字究爲多少，恐怕沒有幾個人知悉。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智利人民因這次軍事政變而喪生。

以奧加斯度・賓路察特(Augusto Pinochet)爲首的軍事政府立卽獲得西班牙外交上的承認，美國在九月廿四日承認軍政府，其他二十個國家也相繼這樣做。與此同時，蘇聯及其他一些國家如北朝鮮、東德及保加利亞與它斷絕外交聯繫。阿根廷和祕魯和它維持外交關係，以便那些難民和外國記者可離開智利。

軍事政府上台後，立卽準備與被亞倫德沒收了銅礦的美國公司舉行談判。亞倫德政府曾經宣佈暫時凍結的一些外國資產，軍政府也宣佈解禁發還。這當然受到外國大企業的讚賞，他們因此宣佈對智利軍事政府給予財政「支援」。

「國際貨幣基金會」宣佈以一筆爲數達六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給予軍事政府以完成某些計劃，這些計劃會被中斷達兩年之久。軍事政府甚至可能獲得一筆數達兩億美元的款項以設立基金去進行一項「穩定計劃」。在一些國家的進步政府被親美的勢力推倒後，這類型的「穩定計劃」是常見的。這些計劃至少會降低工資，提高政府指定物品的價格及解僱

大量工人。

此外一些美國私人銀行和其他基金組織都通知智利銀行，願意增加貸款額。一位美國萬國寶通銀行的高級人員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記者說：「如果新的智利領袖追隨巴西的道路」，他期望不久將會有大量投資進入智利，因爲「它能培養最好的經濟人員管理國家」。這正是一九六四年巴西右派政變後的情形。

「土地改革」政策中被沒收的土地及其他物業，軍事政府宣佈交還原主；國營工廠和企業也交還給私人經營。軍事政府還成立了一支由十一位親軍事政權的商界首要組成的隊伍，到北美、南美和西歐各國解釋這次軍事政變和尋求外國投資。

除了實行經濟上的倒退政策外，軍政府又容許軍警隨意對民居進行搜查，把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沒收和焚燒，更改那些以共產主義人物爲名的建築物和街道名。廢除一切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和內容的法規和條例，撤銷控制卡車的政府部門和取消管理糧食分配和物價的機構。

對廣大智利人民來說，一切舊的景象又呈現在眼前，舊社會的奴役、剝削和壓迫又都向他們頭頂壓下來了。

世界輿論對政變的反應

當亞倫德總統壯烈犧牲的消息傳出後，各地正義和愛好自由的人都感到非常震驚。在紐約、華盛頓、西柏林、波昂、倫敦等大城市均有示威遊行，譴責這次政變及美國的干涉。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二萬人示威，羣衆焚燬美國國旗，並高呼反美口號。在墨西哥，有四萬人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拒絕承認軍事政權，他們高舉亞倫德的畫像，列隊向美國大使館進發及高呼反美口號。墨西哥更宣佈全國爲亞倫德的犧牲哀悼三天。

除了這些羣衆性的示威遊行外，世界各國領導人也紛紛就這次事件表示了意見。

澳洲總理韋特拉曼表示不承認智利軍事政權。

西德總理布蘭特也就這次軍事政變發表了聲明，說「這次政變粉碎了數以百萬計拉美人民以非暴力手段改變社會的希望」。

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對這次政變表示了意見，中國的周恩來給亞倫德夫人的電報說：「偉大的亞倫德生前爲了智利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鬥爭以及促進中智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事業，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對亞倫德的犧牲表示深切悼念。此外北朝鮮、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家也發表了意見，對智利人民英勇

鬥爭的精神給予崇高的評價。

「革命左派運動」對政變的看法

以下是訪問「革命左派運動」總書記米高·安萊利桂斯(Miguel Enriquez)的記錄。這是政變後該組織的第一次對事件的公開聲明，一些歐洲記者幾經艱難才把它運出智利。曾刋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的美國「前衛」周刋。

安萊利桂斯在政變後就藏匿起來，軍方懸賞五千美元及可以在他身上搜出的款項，徵求捉拿他的情報。

問：你認爲亞倫德爲何會被推翻？

答：這次危機多年來一直在醞釀着，只是在人民聯盟政府上台後更爲明顯。亞倫德政府加深了國家機器的和資產階級內部的危機，並且加强了羣衆運動的力量。如果政府能夠被用作爲工人階級鬥爭的工具的話，亞倫德政府是可以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製造條件的。但是人民聯盟政府的改良主義策畧爲資產階級的法權規限而動彈不得，而且也沒有認眞對付所有的統治階層。相反的，它却和一部分的資產階級實行聯合。它沒有找尋革命工人組織的支持，也拒絕和士兵及非委任級官員聯合；相反的，却企圖在

資產階級國家結構中去强化自己。人民聯盟政府希望和軍隊將領及一部分資產階級聯盟。改良主義的幻夢使得統治階層可以在國家的上層建築中强化起來，並從這裏發動進犯。進犯初時以大資產階級的組織爲基礎，跟着以小資產階級，其後以軍隊的將領爲基礎，最後導致流血的軍事政變和工人被鎮壓。由改良主義幻夢而造成的嚴重損害，今天正由工人、他們的政黨和他們的領導人付出代價。這些政黨和它的領導人直至最後一分鐘仍在奮勇地而又悲劇式地保衞他們的幻想。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家聖祖西特的一句名言「那些只把革命進行一半的人只是在掘着埋葬自己的墳墓而已」，今天戲劇式地應驗了。

問：這次左派遭遇到的挫折是不是意味着智利的社會主義的鬥爭要中斷一段很長的時期？

答：我們不感到現在是把左派內部的分歧重提的時刻，但我們覺得工人和左派應該吸取這次事件的教訓，永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我要坦白地指出：在智利，無論是左派、社會主義或革命都沒有被擊敗，只是改良主義的夢想悲劇地收場罷了。有人希望在利益受到最大損害的人卽統治階級的允許和不抵抗的情況下改革社會結構和進行革命。

在任何方面來說，鬥爭都沒有停止而正是開始。當然這場鬥爭是艱苦和漫長的。羣衆和左派並沒有被粉碎。在目前新情況下，左派和工人的力量初期是會遭到一些削弱，但是

很快便能復原，再次加强他們的實力，因爲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會加入反抗獨裁統治的鬥爭。小資產階級昨天還在反對人民聯盟政府，今天他們反對那血腥的法西斯軍事政權，反對軍事政府的鎭壓和不民主的措施。今天已經有一個穩固而廣泛的力量反抗法西斯專政統治，這股力量將日益發展起來。

問：你對現在政府的前途有何看法呢？

答：它決不會長久的。智利還沒有像過去的德國一般有一個强有力和擴張主義的資產階級，也沒有像巴西的資產階級一般具有强大的經濟潛力。現在拉美各國和世界的形勢和過去已不一樣。今天，社會主義陣營强得多了，印度支那人民在越南、老撾、柬埔寨給予了帝國主義沉重的打擊，北美和拉美各國資產階級內部危機日益擴大，在拉美各國，尤其在智利，羣衆運動日益發展。智利的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雙手將會繼續染滿血腥，將會對人民進行更大鎭壓，將會面臨更大的內部矛盾，並與部分的資產階級發生衝突。與此同時，工人反獨裁政治的運動會發展起來，最後推翻軍事政權。人民和工人經過這次最戲劇化而又最佳的政治教育後，一定會跨越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專政所設置的障礙，恢復智利的自由和民主，踏上由工農領導的眞正革命的大路。

問：根據你所獲得的資料來看，對外傳美國曾參與這次政變，你的見解如何？

答：在軍事政變前一個月，我們在全國的電台揭發一名美國大使館人員於今年（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凌晨一時在亞利卡港（Arica）一艘巡洋艦上與海軍司令部將領和北部軍區的若干名陸軍將領會議。我們同時揭發在六月及七月期間每艘戰艦都有一名美國海軍情報處官員隨行。這些事件海軍當局都沒有否認。

反革命計劃的每一個步驟都是由美國海軍情報處和巴西軍事使團指揮和策劃的。

問：現階段的工作是什麽？

答：總的來說是聯合一切準備起來和獨裁政權作鬥爭的民主人士和左派人士，以新的方法重組羣衆運動，並在全國範圍內發展一切形式的反獨裁政治運動。

宣佈戰爭的是法西斯軍事將領，而不是我們。這場戰爭的規則是它們訂立的。它們使用了任何其他戰爭所沒有的極其血腥的手段；把所有反抗它的人一律處決。換而言之，這是一場只有死亡，沒有俘虜的戰爭。

這是一次長期而艱巨的鬥爭，但是人民和工人階級在他們的先鋒戰士領導下必然獲得勝利。很多人在鬥爭中犧牲了，而且還會有很多人在鬥爭中犧牲，但他們的事業後繼有人。鬥爭將會繼續直至法西斯政權被推倒、自由民主獲得恢復，人民走上工農領導的革命大路爲止。

問：你對於其他各國對智利左派的聲援有何感想，你對於那些不在智利本土而希望幫助你們事業的人士有哪些建議呢？

答：國際間的團結是重要的。一些政府對於軍事政權拒絕承認，全世界各國民主和革命人民動員起來聲討法西斯軍事政變，這些都給我們很大的支援。特別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陣營、古巴革命人士、歐洲和拉美的民主和革命人士、尤其是阿根廷的人民革命軍、烏拉圭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玻利維亞的民族解放軍所給予的支援。國際方面的壓力激化了軍事政權的內部矛盾和它與其他階層的矛盾，也使得軍事政權不得不稍爲收歛它的血腥行爲。

至於在外國可以爲反法西斯鬥爭做什麽，每一項行動都是有用的，例如揭露法西斯政權的罪惡行爲，對我們在國內的反抗行動予以政治和物質上的支援，組織示威遊行並擴展和加强這些行動等等。可能的話，阻止外國政府承認法西斯政權，並鼓勵破壞行動，例如拒絕爲來自智利的貨船下卸貨物。當前主要任務之一是要求立卽釋放在獄中的智共總書記路斯·高韋倫(Luis Corvalan)和停止殺害及虐待被囚禁的人。

問：你還有什麽要補充呢？

答：有的，今天正是一位英雄的游擊戰士的紀念日（十月八日是捷·格瓦拉逝世之日），我們要向貢獻了自己生命來維護他的理想的亞倫德總統，向千萬來自各左派團體的

英雄與烈士，向爲反對法西斯主義而血濺街頭的工人致以崇高的敬禮。對於那些此刻仍然遭受虐刑和殺害的同胞致以崇高的敬禮。我們要對革命左派運動的創立人、中央委員會委員、華廸維亞(Valdivia)地區支部領導人、廿四歲的費南度·卡拉斯(Fernando Krausse)，和彭吉波利尼(Panguipulli)地區支部的領導祖斯·G·藍達道(Jose G. Liendo)致以特別的敬禮，他們二人在幾天前在華廸維亞省遭法西斯軍事當局處決，在這地區，反抗法西斯的武裝鬥爭正繼續進行着。

十、人民聯盟政府失敗的檢討

從上面的介紹，現在來對亞倫德政府失敗原因來一個檢討是非常有意義的。綜合起來，主要有下面幾點：

（一）在與資產階級的激烈鬥爭上，人民聯盟政府對於現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兩條路綫中的修正主義路綫過於迷信，認爲可以使用「和平過渡」的手段獲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由於有這種路綫的傾向，他們幻想可以和資產階級妥協，把國家權力從他們手中轉移過來，因此把鬥爭的意志痲痺了。他們忽視階級鬥爭的基本規律：階級鬥爭是尖銳的，沒有妥協性的，不是一個階級勝利，就是這個階級的消滅。從這種修正主義路綫出發，人民聯盟政府就不免陷入改良主義的死胡同裏去。不單人民聯盟政府忽視了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方式，工人組織——全國工人聯會在改良主義思想的控制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因此工人們鬥爭的形式就只限於示威遊行和羣衆集會，而沒有把革命的人民羣衆武裝起來。一旦反動的法西斯勢力使用了武裝鎮壓，人民就遭到嚴重的挫敗。

（二）人民聯盟政府對資產階級心存幻想，對於智利武裝力量的階級本性也沒有充份的了解，對於智利軍隊「傳統上從不過問政治及一向支持民主選舉的政府」的說法深信不疑。從具體的事實來看，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看法。資產階級國家或政權的軍隊只能爲資產階級服務。要鞏固人民的革命事業，人民必須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

（三）外國勢力的直接干涉：由於亞倫德政府實施一系列維護民族利益和主權的政策，當然影響到美國壟斷集團在智利的利益。因此，這些壟斷集團當然樂於見到亞倫德政府的垮台。當智利軍事政變的消息傳到美國紐約的物品交易市場時，銅的期貨價格立即上升。其他種種跡象也反映出美國會參與了這次政變。美國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曾私下提供一百萬美元活動費，以製造智利的經濟混亂，從而可以阻止亞倫德的當選。此外，他們也對亞倫德政府進行經濟制裁等行動。在政治方面，美國派遣他的「搞政變」專家戴維斯爲駐智利大使，他是這方面的老手。軍事方面，在政變前夕，突然召回了派遣的四艘軍艦，這批軍艦原準備參加九月十三日的定期聯合軍事演習的，這有點「此地無銀」的感覺。

（四）有錢人的罷工：七星期漫長的卡車車主罷工，對依靠陸上運輸的智利來說，是一項十分嚴重的打擊。它癱瘓了智利的工、農、商業運輸，從而引起社會的不安，是促成這次軍事政變的導火綫。這次由中產階級發動的工業行動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反映出人民

聯盟政府未能制訂一個好的政策照顧這些中間階層，未能組織一個强力的聯合戰綫以對付一小撮的大資產階級。

智利事件的歷史意義

亞倫德領導的人民聯盟政府雖然失敗了，智利人民對這次事件也付出很大的代價，但他們將從這次沉痛事件中獲取教訓，其他各國革命人民也將從這個事件中獲得寶貴的經驗。

亞倫德登上政壇的背景，和他當政後所宣稱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得一些人認爲亞倫德創立了一個不以暴力革命手段建立人民政權的道路。這個例子在西方的報刋上被大力渲染和宣傳，使人確實以爲亞倫德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有現實意義的。難怪一些西方的「學者」也讚美亞倫德「對民主的承諾」及「勇於妥協」。美國共產黨就認爲亞倫德的道路也可以應用到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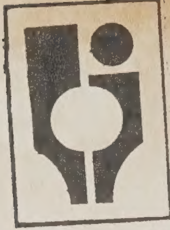
縱然亞倫德主張以和平手段到達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如此溫和和忍讓，資產階級也難以容忍，終於發動一場暴力的軍事政變把它推翻。

現在我們重溫一下亞倫德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時的論

調：「我絕對信任我國的武裝力量，我國的武裝部隊是職業部隊，爲國家爲人民服務的。」和一九七三年軍事政變後亞倫德的夫人在墨西哥向「至上報」的談話：「由於智利軍隊的階級成分，它從來就是一支爲資產階級効勞的軍隊」、「這次政變證明了通過選票和選舉取得政權是不夠的。除了在選舉中獲勝之外，應該把人民武裝起來，或者說應該有一支爲人民服務的軍隊。」

從亞倫德本人和他的理想的繼承人的兩種論調，得出了智利事件的寶貴經驗。這不獨是對於智利人民是有很大的裨益，對全世界革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革命人民的裨益更大。

智利人民的革命事業雖然遭到少許挫折，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必然有犧牲。相信偉大的智利人民不斷努力的鬥爭，必定會獲取人民革命的勝利。道路總是非常曲折的，而且存在着障礙，甚至有時走回頭路，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DATE D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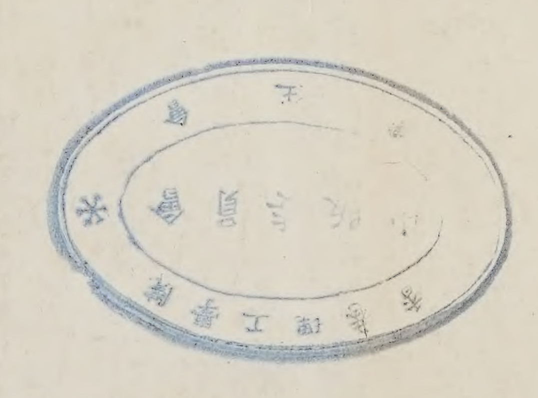
Book returned after the latest date shown is subject to a fine.

內容介紹

一九七〇年，智利的左派聯合陣線「人民同盟」的候選人亞倫德當選了總統。這使不少人產生了一個使用和平的議會道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想法。曾幾何時，亞倫德執政只有三年，就被右派發動的軍事政變所推翻和謀殺。整個事件，可說是第三世界國家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一個發人深省的事例。

本書的內容，是對亞倫德上台前後的智利情況、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措施、以及軍事政變的經過等作一簡要的描述，並對智利自開發時至亞倫德之前的歷史作了介紹。

希望讀者能夠通過閱讀這本書，認識到作爲第三世界一員的智利的奮鬥歷史。



H.K. $3.5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